

# 全球對話

12.1

## GLOBAL DIALOGUE

一年出版3期，以多種語言刊出

### 與Jill Blackmore 談社會學

Johanna Grubner

### 新勞工 運動

Dario Azzellini  
Sarah Raymundo  
Hiroaki Richard Watanabe  
Verna Dinah Q. Viajar

### 多元的 性別體制

Sylvia Walby, Karen Shire,  
Mieke Verloo, Heidi Gottfried,  
Valentine M. Moghadam,  
Ece Kocabiçak, Alba Alonso,  
Rossella Ciccía, Emanuela Lombardo,  
Roberta Guerrina, Heather MacRae,  
Annick Masselot

### 理論觀點

Raewyn Connell

### 悼念 Mona Abaza

Michael Burawoy  
Vineeta Sinha  
Bryan Turner  
Suad Joseph  
Paul Amar  
Syed Farid Alatas  
Sami Zubaida

### 印度的 社會學

Sujata Patel  
Rakesh M. Krishnan  
Sneha Gole  
Soibam Haripriya  
Shireen Mirza

### 議題開講

- > 理解在地與全球的女性謀殺現象
- > 美國政治中的種族主義與反環境主義

MAGAZINE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isa**

第12卷 / 第1期 / 2022.04  
<https://globaldialogue.isa-sociology.org/>

GD



## > 主編的話

**本**期的「社會學對話」討論新自由主義式的治理下，市場化與準市場化如何引發大學與科學等學術領域中的重大變遷。在這次的專訪中，Jill Blackmore 透過自身的研究經驗，與我們分享其洞見——澳洲大學過去十年間的結構性變革如何發生？其背後的力量為何？又對於學術知識的生產與知識正義帶來什麼影響？

本期刊物的第一個專題，以全球各地深具差異的工人運動為討論主題。其中，Dario Azzellini 研究當前疫情對不同地區工人運動的影響，並探索其中性別與種族的面向；Sarah Raymundo 則探討菲律賓殖民主義的軌跡，以及其對工會抗爭帶來的效應；Hiroaki Richard Watanabe 呈現出日本經濟的管制放寬與自由化，如何形塑工會組織和當今工人面臨的挑戰；Verna Dinah Q. Viajar 關注印尼的工會發展，呈現其如何參與在推翻蘇哈托政權的行動中，並將政治與經濟因素納入考量。

一方面，過去五十多年間的資本主義變遷，對許多國家的性別體系造成影響；另一方面，性別關係、生活方式與福利國家等領域中持續發生的變化，也對於不同社會領域中既存的分工、照護責任、價值與規範帶來了挑戰。在專精資本主義、危機與性別之間交互關係的研究者——Sylvia Walby 與 Karen Shire 的帶領下，第二個專題以多元的性別體系為討論主題。這部分的文章闡述了不同國家在性別關係、制度、體系中的差異與共同點，呈現出當代的趨勢，並揭示了資本主義與福利國家的多元樣態，如何與不同性別體系的重組／重構過程緊密交織。

> 全球對話以多種語言刊出，請至 [GD 網站](#)。

> 投稿來信寄給 [globaldialogue.isa@gmail.com](mailto:globaldialogue.isa@gmail.com)。

「理論觀點」專題則延續前述對於性別與社會的反思，由不同的視角展開討論。Raewyn Connell 以男性研究聞名，同時也是此一研究領域的先驅，在這篇文章中回顧了這個學術研究的脈絡，並分析社會與科學的發展如何引領人們重新看待、理解陽剛特質。

我們悲痛地得知，Mona Abaza 於2021年7月5日與世長辭。在此專題中，全世界的同儕與朋友齊聚於此，鄭重地告別這位傑出的社會學家。

「國家焦點」專題由著名的社會學者／社會理論家 Sujata Patel 引領，與不同身份、背景的學者一同為我們帶來對於印度當今社會學的深刻見解；例如暴力、不平等與歧視如何為社會學的田野工作帶來挑戰。

在「議題開講」中，我們與ISA期刊《現下社會學》(Current Sociology) 進行合作；這次的文章邀請 Ian Carrillo 以及 Myrna Dawson 與《全球對話》的廣大讀者群——包含學術領域與非學術領域人士——分享他們各自的研究成果。Ian Carrillo 的研究圍繞著美國的種族主義與反環境主義，Myrna Dawson 則以婦女謀殺議題為焦點。■

Brigitte Aulenbacher 和 Klaus Dörre，  
《全球對話》主編

**isa**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GLOBAL  
DIALOGUE**



## > 編輯團隊

主編: Brigitte Aulenbacher, Klaus Dörre.

助理主編: Raphael Deindl, Johanna Grubner, Walid Ibrahim.

副主編: Aparna Sundar.

執行主編: Lola Busuttill, August Bagà.

顧問: Michael Burawoy.

媒體顧問: Juan Lejárraga.

編輯顧問:

Sari Hanafi, Geoffrey Pleyers, Filomin Gutierrez, Eloísa Martín, Sawako Shirahase, Izabela Barlinska, Tova Benski, Chih-Jou Jay Chen, Jan Fritz, Koichi Hasegawa, Hiroshi Ishida, Grace Khunou, Allison Loconto, Susan McDaniel, Elina Oinas, Laura Oso Casas, Bandana Purkayastha, Rhoda Reddock, Mounir Saidani, Ayse Saktanber, Celi Scalon, Nazanin Shahrokni.

各國編輯:

阿拉伯世界: (突尼西亞) Mounir Saidani, Fatima Radhouani, Habib Haj Salem; (黎巴嫩) Sari Hanafi.

阿根廷: Magdalena Lemus, Juan Parcio, Dante Marchisio.

孟加拉: Habibur Khondker, Khairul Chowdhury, Fatema Rezina Iqbal, Helal Mohiuddin, Mumita Tanjeela, Bijoy Krishna Banik, Sabina Sharmin, Abdur Rashid, M. Omar Faruque, Mohammed Jahirul Islam, Sarker Sohel Rana, Md. Shahidul Islam, A.B.M. Najmus Sakib, Eashrat Jahan Eyemooon, Helal Uddin, Masudur Rahman, Shamsul Arefin, Yasmin Sultana, Syka Parvin, Ruma Parvin, Saleh Al Mamun, Ekramul Kabir Rana, Sharmin Akter Shapla, Md. Shahin Aktar.

巴西: Gustavo Taniguti, Angelo Martins Junior, Andreza Galli, Dmitri Cerboncini Fernandes, Gustavo Dias, José Guirado Neto, Jéssica Mazzini Mendes.

法國/西班牙: Lola Busuttill.

印度: Rashmi Jain, Manish Yadav, Rakesh Rana.

印尼: Hari Nugroho, Lucia Ratih Kusumadewi, Fina Itriati, Indera Ratna Irawati Pattinasarany, Benedictus Hari Juliawan, Mohamad Shohibuddin, Dominggus Elcid Li, Antonius Ario Seto Hardjana, Diana Teresa Pakasi, Nurul Aini, Geger Riyanto, Aditya Pradana Setiadi.

伊朗: Reyhaneh Javadi, Niayesh Dolati, Sayyed Muhamad Mutallebi, Elham Shushtarizade.

哈薩克: Aigul Zabirova, Bayan Smagambet, Adil Rodionov, Almash Tlespayeva, Kuanysh Tel, Almagul Mussina, Aknur Imankul, Madiyar Aldiyarov.

羅馬尼亞: Raluca Popescu, Raisa-Gabriela Zamfirescu, Irina Elena Ion, Bianca Mihăilă, Alina Alexandra Nițoiu, Ruxandra Păduraru, Ana-Maria Rentea, Maria Vlasceanu.

俄羅斯: Elena Zdravomyslova, Daria Kholodova.

臺灣: 李宛儒, 呂道詠, 洪柏勝, 陳昱嘉, 廖宇雯, 洪崇仁, 黃翊碩, 申昉晏, 簡芊樞.

土耳其: Gül Çorbacıoğlu, Irmak Evren.



在這篇訪談中, **Jill Blackmore** 討論了澳洲大學數十年以來經歷的結構性改革、促成改革的動力, 以及其對於學術知識生產與認識論正義帶來的影響。



本專題討論世界各地的眾多工人運動與抗爭, 這些抗爭的性質從全球範圍的運動, 到日本、印尼與菲律賓的特定抗爭活動。



本專題中的文章以**各種多元的性別體制**為主題, 討論在進行全球分析時, 會需要怎樣的新視角來理解鉅觀的性別關係。



Global Dialogue 由 SAGE 贊助

# > 目錄

主編的話 2

## > 社會學對話

創業型大學與知識不正義  
Jill Blackmore 專訪  
Johanna Grubner, 奧地利 5

## > 新勞工運動

疫情下的階級抗爭  
Dario Azzellini, 墨西哥 8  
菲律賓軍事勞工組織  
Sarah Raymundo, 菲律賓 10  
日本工會與勞動市場的放鬆管制  
Hiroaki Richard Watanabe, 日本 12  
印尼工人對蘇哈托政權的抵抗  
Verna Dinah Q. Viajar, 印尼 14

## > 多元的性別體制

性別體制的未來  
Sylvia Walby, 英國 和 Karen Shire, 德國 16  
性別體制是否出現了新變項?  
Sylvia Walby, 英國 18  
一切盡在家庭: 保守的性別體制  
Karen Shire, 德國 20  
我們能看到歐洲的性別體制轉型嗎?  
Mieke Verloo, 荷蘭 22  
公共性別體制: 聚合分歧  
Heidi Gottfried, 美國、Karen Shire, 德國 24  
性別體制、政治與世界體系  
Valentine M. Moghadam, 美國 26  
土耳其父權國家的決定因素  
Ece Kocabiçak, 英國 28  
存在一種南歐的性別體制?  
Alba Alonso 和 Emanuela Lombardo, 西班牙;  
Rossella Ciccia, 英國 30

太過遙遠的危機? 歐洲後疫情時代的性別體制  
Roberta Guerrina, 英國; Heather MacRae, 加拿大; Annick Masselot, 紐西蘭 32

## > 理論觀點

玩火自焚: 陽剛氣質的社會學  
Raewyn Connell, 澳洲 34

## > 悼念專欄

悼念 Mona Abaza (1959-2021)  
Michael Burawoy, Vineeta Sinha, Bryan Turner, Suad Joseph, Paul Amar, Syed Farid Alatas 以及 Sami Zubaida 37

## > 印度的社會學

印度社會學的新方向  
Sujata Patel, 瑞士 40  
解構印度中部的部落地理  
Rakesh M. Krishnan, 印度 42  
女性主義交織性: 新取徑  
Sneha Gole, 印度 44  
動盪的田野: 暴力場域的社會學實作  
Soibam Haripriya, 印度 46  
印度都市勞工的種姓制度汗名  
Shireen Mirza, 印度 48

## > 議題開講

數據缺乏阻礙女性謀殺的識別及預防  
Myrna Dawson, 加拿大 50  
美國政治中的種族主義與反環境主義  
Ian Carrillo, 美國 52

『暴力是否與政體、經濟、公民社會並列，是第四個制度性領域?』

Sylvia Walby 與 Karen Shire

# > 創業型大學與知識不正義

## Jill Blackmore 專訪



**Jill Blackmore** 是澳洲 Alfred Deakin 大學藝術和教育學院的教育學教授，以及社會科學院院士。她從女性主義角度研究全球化、學校和高等教育政策以及治理；國際和跨文化教育；領導力和組織變革；研究評鑑和知識正義；空間重劃和創新教學法；以及教師和學者的工作。最近的項目集中在國際學生的流動性、身份、歸屬感和聯繫；中國和印度的雇主對畢業生就業能力的態度；以及學生自治改革。之前的一個專案將在《創業型大學的領導力破壞：斷裂與差異》中發表 (Bloomsbury, 2022)。Blackmore 一直是與教育、性別平等和多元政策有關的諮詢委員會和法定機構成員。她為OECD、政府、私人和專業組織提供政策建議，並制定了評估框架。Blackmore 曾是迪肯大學未來教育與創新研究中心的首任主任，澳洲教育研究協會主席，目前是澳洲大學教授協會副主席。在這裡，她接受了奧地利林茨 Johannes Kepler 大學博士研究員、《Global Dialogue》助理編輯 **Johanna Grubner** 的採訪。

| Jill Blackmore

JG: 你一直在研究澳大力亞大學在過去30年裡所經歷的，廣泛的結構調整。這些調整是什麼？什麼力量推動了這些調整？它們對學術知識生產產生了什麼影響？

JB: 澳洲和各國政府都試圖使大學與國家經濟體更加緊密地聯繫，在澳洲，這樣的嘗試是從1990年後將大學部門統一為39所大學開始。新的公共管理方法和促進市場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在英語國家廣泛流傳，並在此時滲透到了大學。三十年來，全球的大學經歷了國際化、管理主義、市場化、金融化，現在又經歷了數位化以及伴隨的資料化的過程。副校長和院長通過連續的結構調整積累了大量的行政權力，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他們用任命的方式取代了選舉產生的院長和校長。與此同時，在大學需要靈活應對不斷變化的地緣政治和政策波動的口號下，高階主管階層也成倍地擴大。大學的教學經費是根據特定課程的學生人數而定的。由於政府資金的減少，澳洲大學越來越依賴國際學生的可支配收入，從而導致

了對市場行銷的大量投資，以及教學對研究的交叉補貼。

組織結構調整被認為是提高效率和效益的解決方案，其效果卻從未進行過評估。政策和預算方面的管理權力的集中化，使學術管理的合議制慣例被擱置一邊，學術委員會只負責品質保證的工作。學者們對高額的工作量和在決策中缺乏作用表示了極大的不滿。體制的靈活性是通過學術勞動力的零工化和高教學負荷實現的。這對女性的影響尤其大，她們往往是約聘工，而且集中在學術勞動力的較低層次。再加上2010年引入的研究評估，這些趨勢對知識生產的總體影響是，可以計算的東西（如衡量標準）或商業化的東西更受重視；因此，學術實踐已經被量化，並被聚焦在可衡量、即時的產出所改變。

JG: 您能否談談從綜合性大學到創業型大學的轉變所帶來的影響，特別是對女性學者和女性主義知識生產的影響？

>>

JB: 隨著政策重點從1990年代的研究能力培養轉移到千禧年的品質和卓越,以及全球排名和研究評估,風險投資公司試圖通過優先考慮教學和研究,使每所大學都與眾不同,從而導致澳洲大學之間和大學內部的差異化加大。這使得大學從綜合性大學轉變為注重與產業、政府和慈善家合作的創業型大學。研究生市場也隨著鬆綁而崩潰,多個新的私立高等教育機構在網上和網下競爭,並提供微型證書—在有利可圖的利基市場上提供更短、更便宜的課程。

社會上的保守派政府將大學視為進步主義的場所,在民粹主義的 Murdoch 新聞機構和極右翼媒體評論員的推動下,於1990年代發起了反對多元文化、女性主義和原住民轉型正義的文化戰爭。社會上的保守派政府利用澳洲的文化敏感度,贊成對教育採取工具主義態度,國家政策側重於科學、技術、工程、數學和醫學(STEMM)。他們無視政府資料,認為人文和社會科學(HASS)沒有職業價值。

多重改組和政治意識形態的影響是性別化的,產生了知識的不正義。第一,因為婦女集中的人社院被合併了,從而減少了人社院在行政決策層的代表。第二,大學在理工領域追隨金錢,如果不是故意的,也是默認的,從而使資源向理工科偏移。第三,即使婦女進入了高級管理層,全國的模式是副校長(DVC)的研究工作由男性主導,幾乎總是來自理工科,而副校長的教學工作或家務勞動則由婦女主導。最後,成為研究型教授所需的不斷升級的工作量和越來越多的門檻對婦女產生了更大的影響,特別是在理工領域,在澳洲,她們繼續承擔著家庭、工作和照護的負擔,卻沒有全民托兒所。在什麼知識具有價值、知識不正義、和如何塑造婦女的學術生涯方面,整體的結構和文化影響是性別化的。儘管學術界、學生和澳洲人的文化具有多樣性,但政策或大學管理層從未提及大學領導階層缺乏民族—種族多樣性的問題。

JG: 你能不能進一步闡述,在澳洲的創業型大學裡,產生了什麼樣的結構性和政治性的知識不正義?而它們又產生什麼後果?

JB: 創業邏輯意味著,知識的價值只體現在其被量化和可能被商業化的能力上。這種量化的邏輯造成了知識不正義。第一,它忽略了知識生產的

社會和物質條件—同僚和合作的社會關係、教學和研究的情緒勞動,以及支持這項工作的再生產家務勞動。第二,它以市場契約主義為前提,忽視了知識生產的這些關係(同事關係)。第三,這種邏輯假定,創新只是能夠導致一個途徑或產品,並將經濟關係與社會關係區分開來,而不是依賴它們。因此,創業主義助長了一種保守和有毒的性別政治,貶低了關注社會和關係的學術工作。這對民主國家來說是危險的,因為在澳洲、在這個後真相時代,社會上保守但支持新自由主義的政府一直與大學部門對立,專業知識和科學不僅受到陰謀論者的挑戰,也受到政府的挑戰。

JG: 談到保守派和新自由主義政府對大學部門的對立立場,在最近的危機中,特別是在疫情中,社會科學知識和研究與對這些危機的社會和政治反應之間存在著明顯的脫節。澳洲在這一領域的情況如何?最近的發展如何?

JB: 澳洲人在大流行病期間表現出集體意願,願意接受為了公共利益而暫時喪失的權利,他們意識到並重視全民健康體系和科學的安全網所帶來的好處。問題在於保守的政府(和風險投資公司)以及澳洲人的敏感度,沒有認識到人文社會科學的文化、政治和經濟價值,往往把科學等同於理工科。然而,大流行病和氣候危機都突出了人文社會科學的重要性。首先,社會科學和人文學院是首席科學家創建的快速反應論壇(專家小組模式)的一部分,為國家內閣提供建議。其次,在國家和原住民族領袖管理疫情爆發的溝通實踐中,人文社會科學的作用是顯而易見的。社會心理學研究對於理解個人和集體對疫情的反應,以及記者和學者對人權、責任的影響進行監測和辯論的關鍵政治、經濟和社會分析皆很重要。儘管如此,當新自由主義聯邦政府採取前所未有的經濟行動來支持企業和個人時,它繼續對人文社會科學進行意識形態上的戰爭,將大學和藝術排除在聯邦支持之外,告訴50萬國際學生如果他們不能養活自己就回家,並引入立法,使人文社會科目更昂貴,職業課程更便宜,同時減少大學的人均贊助經費。

在政治上,總理被各州州長強迫接受封鎖各州邊界以控制病毒的爆發,這些行動是州長作為領導人的重要政治資本,與總理未能及時進行隔離和疫苗接種的失敗形成對比。在每天的新聞發佈會上,各州州長與首席衛生官員站在一

&gt;&gt;

起，提供專業證據和政策。隨著流行病學家、科學家和科學評論人成為名人，科學的合法性得到了恢復。此外，雖然藝術和餐飲業是經濟上受影響最大的部門，其在防疫政策的線上環境下，對於現今社會的心理健康和恢復至關重要。另一個矛盾是，總理依靠科技作為減少碳排放的解決方案，但同時卻不增加對大學的研究和開發資金。

JG: 最近，你一直在反對澳洲大學一職員和學生一在政府的防疫規定期間所面臨的情況。您的主要批判是什麼？您對這些發展及其對學術界未來可能產生的影響有什麼擔憂？

JB: 澳洲政府，特別是最近的聯邦政府對大學的管理一直很粗心。他們把大學當作收入來源（教育服務是2019年的第三大出口），而不是把大學作為知識生產者以及民主國家的核心批判與良心進行投資。當國際學生的流動停止時，這種疫情暴露了澳洲大學因資金不足、依賴國際學生進行研究、政策波動、印度—太平洋地緣政治的變化和中國崛起而導致的脆弱性。風險投資公司的反應是利用機會進行重組（經常使用管理顧問），在18個月內裁減了40,000名學術和專業人員（占員工總數的20%），並且不與占員工總數66%的合同或會期學者續約。特別是人文社會學科項目被迫關閉（例如，語言、社會學）。由於工作的不穩定性、工讀生的高比例、行政工作的超負荷、研究經費的缺乏、管理主義、治理的企業化、決策權的剝奪以及對建築和金融市場的風險投資，學者們已經對大學管理失去了信任。這種不信任已經通過新興的集體行動轉化為憤怒，例如澳洲公立大學聯盟的形成。學術界認為，大學與私營教育機構、顧問公司的邊界正受到威脅。多個教育機構正在提供更便宜的微型證書，跨國公司正在投資培訓，同時從政府的研究和顧問外包中獲益。當多種挑戰需要新的知識、創造力和創新來指導社會和經濟轉型以實現永續未來時，高等教育的空洞化將需要幾十年的時間來恢復。

JG: 在您看來，要改善澳洲大學教職員生的狀況，加強大學在社會上的作用，可以從哪些方面著手？實現積極變化的主要支點在哪裡？

JB: 一個關鍵問題是如何轉變澳洲的文化敏感度，使其認識到大學和人文社會科學對澳洲的文化、社會和政治未來的重要性。這意味著要教育民眾和政府，讓他們認識到大學的獨特之處，在於它們不僅僅是讓畢業生「做好就業準備」。風險投資公司已經浪費了機會（或缺乏集體意志）來領導關於大學對民主重要性的辯論，或說服政府大學研究對過渡到永續發展的未來是至關重要的。

在內部，大學管理者必須通過提供有保障的就業和安全的工作環境來重新贏得員工的信任。共同治理將利用目前被管理層忽視的學術界的專業知識。它需要學術界在管理層和關鍵遴選小組中的代表、促進與鼓勵批判性辯論的一個獨立的學術機構、保護而非限制學術自由與工作條件的一個勞資協議、促進有意義的回饋而非象徵性協商的一個合作決策過程，以及平等和環境導向的戰略計畫和預算。因為大學是城市和地區社區和經濟的核心，有義務為當地社區提供全面的教育。大學之間更多的專業化和差異化將減少學生的機會，這些學生由於距離和成本的原因，已經在努力進入和保留在大學裏頭。一所好的大學會認識到知識的多元性，人文社會科學對永續性和包容性學習環境，以及民主的重要性。它將促進以社會的或關係的（而不是市場的）契約主義為前提的社會創新，重視關係（同僚關係）作為大學與社會中，存在與行動的核心。■

來信寄至：

Jill Blackmore

<[jillian.blackmore@deakin.edu.au](mailto:jillian.blackmore@deakin.edu.au)>

# > 疫情下的階級抗爭

Dario Azzellini · Universidad Autónoma de Zacatecas · 墨西哥



2020年5月18日，美國雅基馬谷地的農場工人為取得較佳疫情安全的工作環境而罷工  
來源：臉書頁面 Familias Unidas por La Justicia · Edgar Franks°

在資本主義的危機下，原有的社會不平等變得越加嚴重，而新冠肺炎的肆虐也使得這個現象變本加厲。相較於2019年，2020年的前九個月勞工收入大約減少了10.7%（約等於三兆五千億美金）；於此同時，超過兩千兩百位億萬富翁的總資產額從2019年的九兆五千億美金上升至隔年的十一兆四千億美金。全球各地的研究皆顯示貧窮和勞動階級人口的COVID感染率和住院率較高，其中黑人、原住民以及特定種族的勞動階級更有顯著的染疫率以及死亡率。

## > 疫情所致的抗爭

這段期間工人階級發起了各種抗爭，有些因疫情而起，有些則與其沒有太大的關聯。因為疫情而日益漸增的壓力和染疫風險，使一些受影響層面較廣的行業開始出現各種遊行抗議和罷工示威活動，特別是低收入和工作環境較差的職業。例如：醫療保健工作、護士、倉儲業、郵購業務、後勤工作、大眾運輸業和食品製造業中的肉製食品及農產品業者。

醫療保健業作為近幾十年新自由主義下減縮政策的主要目標之一，在歐美國家、亞洲、非洲等地均有發生罷工。這領域的從

業人員多為女性；特別是護士一職，其低薪高風險的現況還同時涉及到性別和種族層面問題。不只如此，罷工行為也發生在大眾運輸業，美國許多城市皆出現司機自組性的示威活動：2020年5月，布魯塞爾市的司機們在工會未經他們的許可下與資方簽訂協議後發起罷工表達不滿；而在墨西哥市、哥倫比亞的麥德林市、智利的首都聖地牙哥和日本等地的地鐵工作人員均有發起罷工示威行動。德國工會 ver.di 的成員在市區的大眾運輸上發起一系列的抗議活動，而義大利和希臘也出現國營與私有大眾運輸業針對工作安全和薪資提升兩大訴求的罷工。食品業者的罷工則是從美國和西歐的肉品加工業開始，該行業的員工多為移工，有著極高的COVID-19感染率。在義大利、西班牙和美國，移工身分的農夫發起罷工，而其他國家的食品零售業也一同響應。疫情爆發初期，美國和澳洲的物流和配銷業為了增加相關配套保護措施而發起罷工；在義大利的Amazon、TNT、DHL 和 UPS 等物流倉儲公司都經歷了員工抗議和大量離職的狀況；食物外送員也在疫情間發起了多次的罷工，促使法院強迫公司提供六萬名的腳踏車外送員更多福利。

## > 非因疫情所起的抗爭

也有一些近期的示威和疫情沒有太大的關聯。工廠大量的裁員及倒閉情形造成勞資衝突：隸屬於印度塔塔鋼鐵的荷蘭愛默伊登鋼鐵工廠，其員工曾

發起長達三周的罷工行動，成功保障了1000名員工的工作並承諾續聘到2026年。2020年的12月，印度發生了一場針對政府放寬公共部門的勞資關係和私有化制度的大型罷工，大約有兩億五千萬來自國營和私有單位的勞工參與此次的罷工。從2020年的9月，印度的農夫對政府新推動的政策感到不滿，因該政策將為私有公司帶來極大的好處，卻犧牲掉農民的權益，便為此發起抗爭；2021年1月，農民的抗議行動席捲整個德里市，政府才將這個政策暫停18個月。2020年來自德國、西班牙和波蘭的亞馬遜員工在10月的周年慶(Prime Day)當天，以爭取更高的薪資為目的發起罷工活動，緊接著德國的亞馬遜工廠也有幾個較為小型的罷工隨之發起。在西班牙畢爾包和巴斯克自治區的港口內，各公司的碼頭工人們聯合發起為期55天的罷工，直到公司接受他們的幾項訴求，包含：每年至多1826小時的工時、增加工作時的休息時間和假期。

疫情期間，各類勞動階級的反抗也相繼出現。在玻利維亞，對獨裁政權的抗議強制促使政府舉辦一場新的選舉，並使得原先被獨裁政權抵制的爭取社會主義運動政黨(MAS)重新拿回席次。在美國，美國勞工聯合會和產業工會聯合會(AFL-CIO)沒有給予2020年5月由黑人領導的多種族勞動階級抗爭適當的回應；然而，單就該年的五月和六月，仍有超過600起停工和罷工的事件響應黑人的命也是命(BLM)，公車司機也拒絕將抗爭者送達監獄。2020年6月9日為喬治·佛洛伊德的葬禮，國際海岸及倉庫聯盟(ILWU)以關閉美國太平洋沿岸港口將近九分鐘的方式紀念他，而在六月節當天，國際海岸及倉庫聯盟也在29個西岸港口發動了八小時的接力罷工。7月20日國際海岸及倉庫聯盟、聯合農場工人(United Farm Workers)和全國家政工人聯盟(National Domestic Workers Alliance)在超過25個城市舉辦為黑人抗議(Stikes for Black Lives)的活動，共同響應黑人的命也是命。

## > 勞工運動的新起點

疫情期間的抗爭與以往的情形相同，大多的抗爭都是由基層員工自主發起的，展現出更多元且迅速的模式；而傳統公會大多會迴避太過激烈的抗議，只有在基層員工的施壓下才有機會參與行動。新自由主義和商品型態的轉變帶給傳統的組織很大的衝擊，雖然近代的抗爭和組織出現國際化的趨勢，但勞工運動的弱點仍不能被忽視。在多數的事件中，勞工運動離成功爭取到權益仍有很大的差距，然而疫情期間的勞工動員證明了階級不再是社運中分類的其中一種方式，這樣的假設是錯誤的。不只如此，全球供應鏈並不穩固的事實再次給予勞工在全球產業界一定的地位與聲量。

大規模阻斷商業利益的能力至今仍是勞工重要的武器之一，在此前提下，正如勞資之間的互動，產品製造與再製之間的關係也需要被重新思考。在這個資本主義主宰的社會，移工成了新勞動階級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性別和「種族」也並未抹滅階級在勞工運動中的位置——如何分析三者之間在資本主義與剝削階級中的互動關係，正是我們應該關注的問題。在 Paola Varela針對女性在勞工運動中的分析中，他給予了精闢的見解：「工作場域不應只被單純視為經濟生產的場所，應將其轉化成強化全體勞工聲音的重要工具與催化劑。」■

來信寄至：

Dario Azzellini <[da483@cornell.edu](mailto:da483@cornell.edu)>

# > 菲律賓軍事 勞工組織

Sarah Raymundo, 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 Diliman,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Bulatlat.com 專欄作家, 人民抗爭國際聯盟 (ILPS) 組織者。



Kilusang Mayo Uno 工會 (KMU) 成員於菲律賓示威。  
來源: KMU。

1896年菲律賓發起革命，反對西班牙將近四百年的殖民統治。不久後，這場革命的戰果便遭美國帝國主義所破壞殆盡。1898年的《巴黎條約》使西班牙帝國下的國家（菲律賓、古巴、關島和波多黎各）合法地轉移至美國之下；針對此舉，美國向西班牙支付了 2000 萬美元作為「補償」。這標誌西班牙帝國的終結和美國帝國主義對菲律賓的持續殖民。這是個充滿新殖民主義制度色彩的種族滅絕計劃。持續殖民便導致菲律賓經濟持續低落，並維持以出口為導向和依賴進口的經濟，同時還擁有大量的後備勞動力。

## > Kilusang Mayo Uno, 五一運動

在此脈絡下，諸如提高工資和契約化計畫等經濟運動都必須被視為政治抗爭。五一運動 (KMU) 始自 1980 年 5 月 1 日，共有以下目標：一、集結並代表在戒嚴時期倡議反法西斯的勞動

組織；二、組織並凝聚進步工人組織，使各組織朝反美帝的民主抗爭邁進。

2018 年，KMU 向國際工會聯合會 (ITUC) 提交了 115,000 名正式會員。KMU 當前的政經工會工作包括在出口加工區 (EPZ)、都會貧困社區、客服中心和私立醫院進行紮實的實地組織；與其他工人建立廣泛結盟以爭取工資和反對暴政；以及在 COVID-19 流行期間為大多數勞工關懷的問題提供廣泛的倡議。KMU 堅持農工聯盟的原則，將其視為爭取民族解放抗爭的關鍵力量，繼而展現全球南方的勞動力如何不斷反抗帝國主義的暴力剝奪。

在菲律賓的 1.08 億人口中，大約 390 萬 (3.6%) 是工人，其中包括製造業、建築業、出口增長型企業的工人和其他薪資勞動者。2017 年起，KMU 組織起來解決契約化現象和菲律賓勞

工逐漸半無產化(semi-proletarianization)的現象。後者推動了 KMU 在城鄉貧困社區的組織能力。在貧困社區中，共有 1040 萬的非正規工資勞動者和 630 萬的非工資勞動者，如供應商和其他非正規工人。

### > 菲律賓的勞動場址和模態

一直以來，無土地的農民階級都是外國農業企業の後備勞動力和農場工人。流離失所的無地農民居住於都市，並在當地工廠和跨國出口加工區擔任契約工人。嚴格的契約化政策導致工作不穩定和去工會化(de-unionized)的工作場所。找不到工作的人，就只能進入非正式的經濟體系。

缺乏工業基礎是菲律賓失業問題的根源，這也為兩種勞動模態鋪平了道路，使得外包和出口勞動滿足了全球資本對廉價服務勞動的需求。

第一種模態是外包勞動。菲律賓毫無疑問是世界的「客服中心首都」——超過了最接近的競爭對手印度——佔全球市場的16%至18%。菲律賓全國共有 851 家註冊業務流程外包(BPO)公司；其中一半以上是客服中心(429)，其它大部分是提供 IT 相關服務的公司(400 間公司，佔 46.2%)。其餘的是醫學轉錄外包業務和動畫電影和卡通製作公司。菲律賓作為美國的半殖民地，不僅 65% 的外包服務給了帝國主義主子，還得同時為來自歐洲、澳洲和紐西蘭的客戶提供服務。最新數據顯示，BPO 從業人員共有 675,600 人。被政府稱為國家「陽光產業」的菲律賓勞工必須遵守客戶所在時區的工作時間。

第二種模態是出口勞動，而這一直以來都是菲律賓的權宜之計，也是迄今為止的政策根柢。海外菲律賓工人(OFW)佔據收入者的頂端，亦是推進 GDP 的動力。2018 年一份世界銀行報告顯示，僅在 2017 年，菲律賓就從 OFW 匯款中賺取了 326 億美元。

### > 將工人抗爭與反帝國主義聯繫起來

隨著自馬可仕戒嚴以來菲律賓勞工格局的轉變，工人組織也意味著面對帝國主義體制對全球南方工人帶來的後果。這包括基於全球不平等交換的工資等級制度，使得菲律賓勞動力一直維持在低廉的價格。另一個後果是周邊地區大量失業人員的集約化生產，這導致菲律賓勞動力越來越趨向半無產階級化。這說明了外國資本和國內買辦利益之間的伙伴關係決定了勞資關係。菲律賓的半無產階級化是勞動者被帝國主義體制強迫透過無工資、非正規和契約化勞動生存的過程。

這使得城鄉貧困社區等勞動力集中地成為必須培育反帝國主義工人階級政治的場所。許多人的目標是共同轉變社區和國家的社會、政治和經濟層面，而 KMU 則與這些人有了共同目標。KMU 亦會組織家中有吉普尼司機和非正規工人的家庭。KMU 以創新的方式在客服中心組建工人組織，並解決了業務流程外包中種種工資套利的最新形式。

從 KMU 40 年的抗爭經驗中吸取的重要教訓之一是，半殖民地的工會主義無法輕易在經濟或政治抗爭之間做出選擇。就此層面而言，國家扮演重要角色。國家將工人和資本家之間在特定生產場所內受限的經濟抗爭轉變為全球化政治抗爭的場所，而這類場所則證實了列寧主義的國家觀：國家是剝削被壓迫者的工具。在此脈絡下，像 KMU 這樣的全球南方工會只能在歷史抗爭中積極反對帝國主義和國際主義，藉此將勞動力從全球資本的魔爪中解放出來。這些反帝反法西斯的工人階級抗爭，與自由的土地再分配和國家工業化一同邁向光明的社會主義未來，兩者密不可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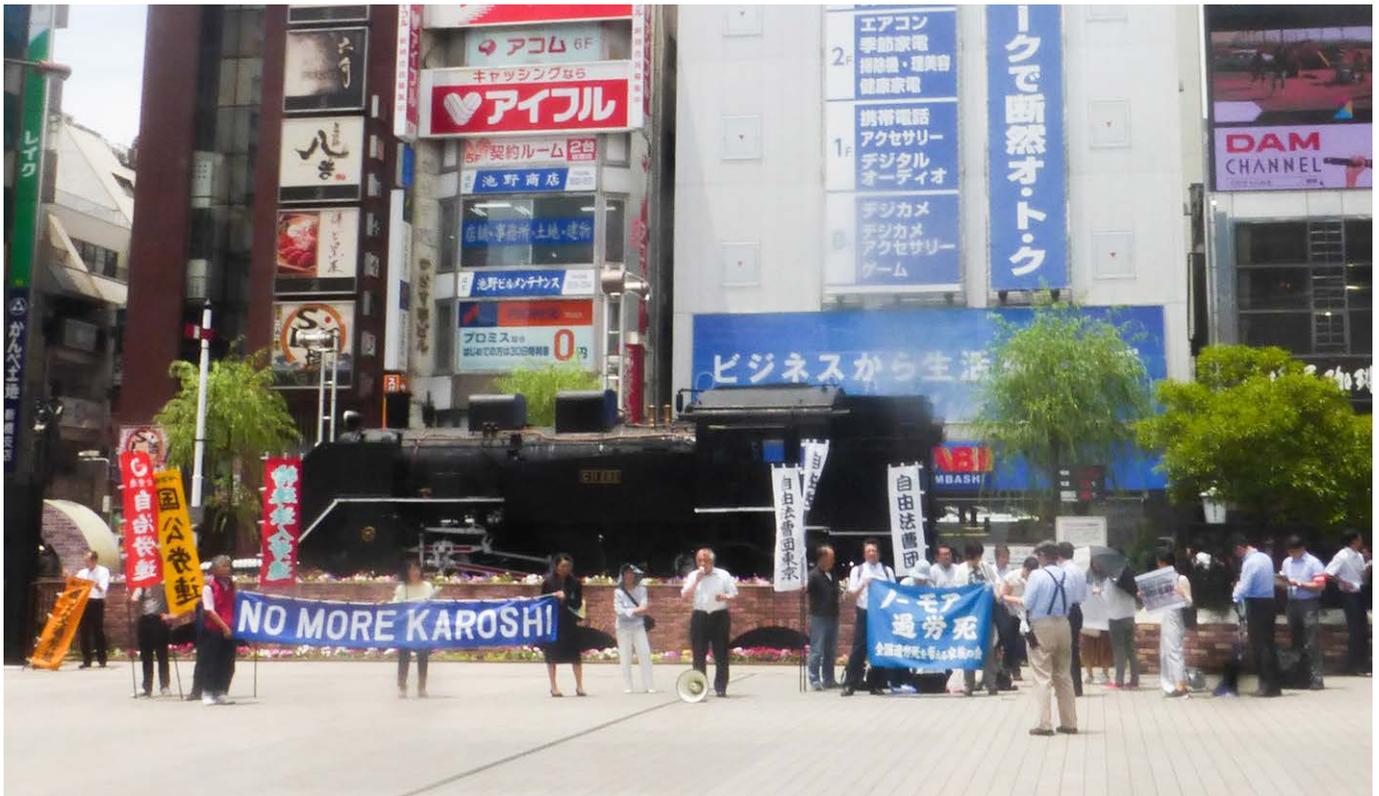
來信寄至：

Sarah Raymundo

<[sarahraymundo1976@gmail.com](mailto:sarahraymundo1976@gmail.com)>

# > 日本工會與勞動市場的放鬆管制

Hiroaki Richard Watanabe · Ritsumeikan University · 日本



2011年・日本新橋の「不再過勞死」抗議活動。  
來源:Nesnad 作品·CC BY-SA 4.0°

日本的經濟從九零年代前期的經濟泡沫化後便停滯不前，當地企業也因其他東亞國家越加強大的競爭力而備感壓力。從九零年代開始，由自由民主黨(LDP)主持的政府便透過增加勞動市場在法規下的自主性，回應勞工針對全球化現象提出的市場彈性訴求。為了落實新自由主義勞動市場的放寬政策，自由民主黨已經將工會從幾個內閣委員會的政策制定席次中除名。

## > 新自由主義的勞動市場鬆綁

針對非正式員工的放鬆管制如下：1999年《勞動派遣法》修法，除了特定的幾個行業之外(包

含製造業)，均可利用勞動派遣；2003年的修法將製造業也納入該法，這在日本經濟層面上是個非常重大的改革。近期，2015年又再次修法，只要雇主每三年換一位派遣勞工，便可以無限期使用派遣人力。

由於新自由主義下勞動市場放鬆制度的實踐，非正式員工的數量增加，大約佔了總勞動人口的四成。然而在2007年到2008年全球經濟大蕭條時，大量解雇現象正反應了派遣人力缺乏完善工作保障的問題，近期受疫情影響，也同樣出現大規模裁員的狀況。從低薪、不易使用社會安全網等面向都可以發現非正式員工的工作情形並不理想。

>>

雖然正式聘請的員工相較之下有較高的保障，然而無論在工資、工時等面向都呈現負面的成長。舉例來說，自由民主黨政府於1998和2003修改《勞工基準法》，透過擴大使用彈性上班時間制度的方式放寬工時限制。正式員工應在修法之後對於自身工時的分配有更大的彈性，但除了於週末、國定假日和夜間工作之外，無法獲得加班費。然而在修法之後員工不只沒有取得工時自主權，反而讓雇主可以更有彈性的使用雇員，並支付更少的薪水。

最近，自由民主黨在2018年的《工作改革法》推出「高專業制度」。被歸類在高專業領域的員工可以更進一步地解除工時限制，同時公司也不用支付任何加班費。雖然該法對於超時的工作時長有所限制，然而工時仍舊非常高（任意六個月的平均加班時數為每個月80個小時以下），且這個新改革並無法有效減少過勞死亡（karōshi）和因過勞產生精神疾病，最後導致的自殺（karō jisatsu）。正式員工也不斷受到被非正式員工取代的威脅，這使雇主可以以此為手段，強迫員工在惡劣的勞動環境下繼續工作。

### > 工會與其放寬制度

自由民主黨這一波針對勞工市場的改革，也削弱了工會的力量，因為隨著非正式員工的人數增加，工會變得難以整合人力，致使工會入會率下降，目前大約只有17%；呈上述，工會的力量也因為失去許多在內閣委員會的席次而被削弱。

除此之外，不同工會對勞工市場放鬆制度的立場不一，削弱了整體工會的權力資源。汽車、電子產品業等國際上主流產業公司的工會，並沒有反對市場放鬆制度的必要性。這些工會組成跨階級的管理階層來維持他們在國際上的競爭力，雖然這樣會犧牲掉非正式員工的權益，但可以保護正式員工的工作。因此，他們並不關心非正式員工工作不穩定的狀況，以及正式員工們越加惡劣的工作環境，例如非法解雇、遲發薪水和長時間工作等問題。

相比之下，無論你在公司的職位為何都能參與的個人從屬工會，會比較積極的要求雇主關注工作不穩定和惡劣的工作環境等問題。這些工會代表了中小型企業（SMEs）中沒被公司工會保障的正式與非正式員工利益，主要解決個別勞工的勞資爭議。然而這些個人從屬工會的權力與資源比公司工會少上許多。

為了補強權力資源的不足，有些個別從屬工會和公民團體組成聯盟參與社會運動。例如，以關注年輕勞工為主的首都圈青年工會（SSU）參與了由公民團體 Aequitas（拉丁語中「公平」之意）舉辦的社會運動「為1500百元抗爭」（Fight for 1500 yen），呼籲政府提高低收入戶的最低薪資。然而這類的聯盟通常都是短期、曇花一現的，組織化程度並不高。

個別從屬工會也嘗試透過遊說、提案、大型抗議等方式體現政治自由。例如首都圈青年工會曾對厚生勞動省等相關政府單位提出提高最低薪資、工作保障和降低工時的政治訴求，希望可以改善年輕勞工們的工作環境。然而除了少數幾次的例外，大多時候這些工會很難對政府勞動政策有實質的影響力。由於這類個別從屬工會是以個人單位在招募會員，並非傳統公司的大量招募，因此在發起行動時很難整合所有的會員，導致許多個別勞工仍在工作不穩定和惡劣的環境下工作。■

來信寄至：

Hiroaki Richard Watanabe  
<[hrwatana@fc.ritsumei.ac.jp](mailto:hrwatana@fc.ritsumei.ac.jp)>

# > 印尼工人對蘇哈托政權的抵抗

Verna Dinah Q. Viajar<sup>1</sup>, 勞動與產業關係學院, 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 Diliman, 菲律賓



2020年8月, 印度尼西亞工會成員在全國各地示威, 反對政府侵蝕勞工權利。  
來源: IndustriALL Southeast Asia。

**俗**言常道, 無法記住過往的人, 注定重道覆轍。在新自由主義帶來種種危機與政經不平等之際, 我們與全球各地興起的專制主義奮鬥時, 也許能參照歷史的教訓。在後殖民時期與冷戰階段, 東南亞各國的工會運動一直以來都在奮力抵抗專制政權。也許研究東南亞的工會運動能帶給我們一些幫助。其中一例便是印尼勞工運動。印尼勞工運動起先是反荷蘭殖民統治運動的一環, 而在蘇哈托專制政權之下遭受迫害, 直至後蘇哈托時期才在民主化過程中重現身影。在蘇哈托專制政權期間, 勞工運動雖然較為無力, 但仍為政權更迭和民主化進程做出不少貢獻。本文主張, 印尼的工會運動和以勞工為基礎的運動不僅是為維護工人利益而成立的, 更是反對蘇哈托專制政權並爭取民主化的關鍵要素。理解組織勞動在印尼民主改革和政權更迭運動中的作用, 也許有助於理解社會力量出現的方式, 亦能鞏固對印尼境內外專制政權的抵抗。

## > 早期勞工運動

1894年起, 在荷蘭殖民政府的統治下, 工會組織被允許存在並逐步發展。1940年代, 工會運動成員增加到十幾萬人, 並朝軍事、左翼、支持獨立的方向邁進。印尼獨立後的第一任總統蘇卡諾(從1945執政至1967)被視為社會主義革命家, 不僅傳承了基進的政治勞動運動, 亦與印尼共產黨(Partai Komunis Indonesia, 簡稱PKI)有深厚連結。除此之外, 蘇卡諾也與逐漸轉向右派的軍事組織有關, 而蘇哈托便是來自這組織。因此, 蘇卡諾執政時期, 左傾工會皆處在印尼共產黨與右派軍事權力的政治衝突之中。為了破除蘇卡諾政府的共產黨勢力, 蘇哈托於1968年推翻並奪取政權。

蘇哈托的「新秩序」(New Order)政權被視為在印尼對共產黨運動最血腥的掃蕩之一, 其政權奠立於對五十萬人的殺害以及對百萬餘人

>>

的逮捕，只要是印尼共產黨的成員或支持者，都是其掃蕩對象。在政治衝突的內爆(implosion)中，軍方亦消滅了軍事左翼工會，藉此確保蘇哈托威權政權的穩定。在東南亞最血腥的政變之一的餘燼中，出現了一場受到壓制和國家批准的勞工運動。對工會運動的壓制與控制進而成為蘇哈托在世上最大的伊斯蘭國家建立專制統治(1968-1998)的先決要件之一。

### > 鎮壓勞工與國家批准的「五原則」<sup>2</sup>勞資關係

二十多年來，印尼的組織勞動皆受蘇哈托的專制政權以「五原則勞動關係」——後來重新命名為「五原則勞資關係」——所控制。五原則架構頌揚的是印尼文化在社區內部尋求和諧的精神，因此，工人和資本家之間的階級衝突被認為是「非印尼」的，且違反了「五原則」。套用這類架構將使任何形式的勞工抗議、尤其是勞工罷工，都被視為違反五原則和煽動不和諧。

五原則勞資關係支持蘇哈托的經濟策略，試圖讓印尼脫離東南亞最貧窮國家的清單。蘇哈托的「新秩序」在1970年代透過石油收入的進口替代而推動印尼工業化；經歷1970年代後期的石油危機之後，「新秩序」在1980年代轉向以出口為導向的經濟增長策略。蘇哈托的政策讓印尼經濟從1980年代開始急起直追，直到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經濟快速增長的情況下，工會運動在低工資的勞動力市場中便顯得相對溫馴(docile)。然而，高速工業化催生出新的社會力量，使得工會開始要求更多的組織自由、集體談判權，並抵制針對工會成員的暴力。在以出口為導向的工業化策略下，勞動暴力和剝削性的工作條件產生出一個新的工人階級，他們普遍不滿受國家控制的無力勞工組織。1990年代初期，獨立工會開始組織起來，罷工也如雨後春筍般浮現出來，預示著向競爭形勞工運動的轉向。

1994年發生了一系列的罷工與工人抗議，這些活動對反專制的改革運動有顯著貢獻。改革運動最終於亞洲金融危機時成功推翻蘇哈托政權。即便組織勞動與改革運動並沒有正式合作，但印尼勞工與工會仍(間接地)影響了政權更迭的民主化運動。工會或組織勞動，以及其它維護工人利益的勞工運動，皆屬於印尼勞工運動的一



來源: IndustriALL Southeast Asia

部分。當與更廣大的民主化運動、反蘇哈托專制政權運動連結起來時，印尼勞工運動的力量便有大幅增長。

### > 結論

在不同的政經脈絡下，印尼勞工運動經歷並演變出不同的樣貌與階段。在蘇哈托政權下，勞工受到壓榨，工會便較為衰弱；但在工人要求如集會自由等只有在民主環境下才能成立的權利時，工會亦促成政權更迭。生產關係的變化催生新的社會力量，如工人階級、城市專業人士和以工人利益為首要考量的團體，這種種皆構成了更廣泛的民主化運動的一部分。在震驚世人的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後，工人運動和學生運動皆在反蘇哈托運動中扮演要角。1998年，軍用坦克在半夜包圍了蘇哈托的住所，迫使他下台。印尼見證了獨裁政權的垮台。由「五原則」這個民族主義意識形態所支持的蘇哈托「新秩序」政權的崩解，預示了印尼政治的新篇章。■

來信寄至：

Verna Dinah Q. Viajar <[vqviajar@up.edu.ph](mailto:vqviajar@up.edu.ph)>

1. 這項工作是通過在柏林羅莎-盧森堡基金會的專制主義和反戰略國際研究小組(IRGAC)獲得的博士後研究金實現的。Viajar女士目前在菲律賓大學迪利曼分校勞動和工業關係學院擔任訪問研究員。

2. Pancasila 是一個政治框架，最初由殖民地獨立領導人蘇加諾提出，旨在統一國家。它建立在人道主義、民主和社會正義的原則之上。蘇哈托挪用了這一流行的政治理念以獲得合法性。

# > 性別體制的未來

Sylvia Walby, 倫敦大學城市學院, 英國, ISA暴力與社會專題組(TG11)共同主持人, ISA經濟與社會研究委員會(RC02)成員/前主席, 婦女、性別與社會研究委員會(RC32)成員; Karen Shire, Duisburg-Essen大學, 德國, ISA經濟與社會研究委員會(RC02)副主席

性別是一個全球性的議題。這組論文探討在分析全球議題時, 如何將鉅觀的性別關係納入考量。他們討論了將各種性別體制理論化的最佳方式。他們為階級分析增加了一個交織的視角, 到目前為止, 階級分析一直是社會學中全球鉅觀層面分析的主要焦點。它們為性別分析增加了一個宏觀層面, 而迄今為止, 性別分析主要是在微觀和中觀層面進行的。

這些論文來自於2020年在 [Social Politics](#) 期刊上的一場辯論, 即如何發展性別體制的多樣性理論以應對當前的危機, 並更嚴格地概括全球南方以及全球北方。如何將危機, 尤其是疫情對性別關係的影響理論化? 與北方國家相比, 全球南方的公共性別體制的種類是否不同?

現代性, 或者說, 多重糾纏在一起的現代性, 是如何被性別化的? 作為社會學理論爭論的核心問題, 現代性的巨大轉變是如何被性別化的? 家庭內的社會關係形式是固有的還是偶然的現代性或前現代性? 性別體制的種類中最重要的是區別是家庭和公共形式的性別體制之間的區別嗎? 在全球北方發現的新自由主義和社會民主形式的性別體制之間的區別是否普遍適用, 或者在全球南方的公共形式的性別體制之間是否有不同的區別?

性別體制的概念挑戰了傳統上將性別議題歸於家庭的做法。性別體制是由整個社會的多個制度領域構成的。這些領域的範圍是有爭議的: 有時包括經濟、政體、公民社會和暴力, 以及剩餘的其他領域。

暴力問題在經驗上被廣泛認為對於性別關係是重要的, 但很少被納入核心社會學理論, 如何解決這個問題? 暴力是與經濟、政體和公民社會並列的第四個制度領域嗎? 鉅觀層面的性別理論化, 需要對這個問題做出回答。鉅觀層面的理論化常常被認為是一種無關性別的政治經濟。這篇論文在這場關於將暴力理論化的辯論中採取了不同的立場: 一些人主張通過將暴力作為一個主要的制度領域來承認暴力對鉅觀層面的性別化全球思考的重要性, 另一些人則主張將暴力分散到其他領域。

照護組織的新發展挑戰了傳統上將經濟縮小到市場化勞動形式的社會理論。照護工作是經濟的一部分, 無論是有償還是無償。經濟的社會關係包括家庭關係, 以及資本和勞動之間的關係。

在同一地區往往有多個不同性別的政體共存(和競爭)。「民族」國家、歐盟(或其他霸權)、有組織的宗教(如天主教會)。他們有不同深度的性別化民主, 所以他們之間的權力平衡的變化是性別化的。

性別關係正在被重新劃分。全球性別化的照護產業鏈需要對宏觀層面以及中觀和微觀進行分析。它們需要分析資本主義和各種性別體制的交織處, 需要分析移民, 也需要分析對方法論上的民族主義所提出的, 特別是性別層面的挑戰。在任何一個有界限的民族國家社會中, 並非所有的社會領域都是一致的。性別關係的重新調整也涉及到地方(新形式的照護提供, 新形式的政治項目)以及(即將成為的)霸權(歐盟和中國, 以及美國)。這些論文提供了不同的方式來思考性別

&gt;&gt;

# 「性別體制的概念，挑戰了傳統上將性別簡化為家庭元素的理解。性別體制是由社會的多個面向共同構成。」

體制在時間和空間上的軌跡，作為不同性別形式的綜合和不平衡發展。

這組論文涉及的實質挑戰之一是，疫情是否推動了性別體制的變化。一方面，有疾病、非必要的死亡和反民主化的進程。另一方面，有新形式的社會凝聚和進步的項目。

這些論文涉及以下主題。Sylvia Walby 闡述了如何將暴力理論化為第四個制度領域，以及不同種類的性別體制如何部署和調節暴力。Karen Shire 討論了保守的性別體制所特有的家庭政策如何未能從根本上改變照顧勞動的性別分工，而這既不是自由主義也不是社會民主主義的轉變。Mieke Verloo 主張明確化我們對家庭的理解，而主張社會如何組織身體、性和親屬關係的概念。她認為「反性別」的右傾是對親密關係的去傳統化的反彈，這在匈牙利和波蘭對生殖權利和性自主的攻擊中可以看到。Heidi Gottfried 和 Karen Shire 在對日本和德國的變化軌跡進行的區域比較分析中論述了性別關係的重新劃分。Valentine M. Moghadam 認為，只有在借鑒世界體系理論，說明處於經濟邊緣和

半邊緣地帶的國家如何受到經濟危機和霸權的影響時，才能理解伊朗和突尼斯的若干女權成果的逆轉。突尼斯婦女權利的逆轉被歸咎於半邊陲國家過度暴露於世界經濟危機，而美國領導的對伊朗的制裁則是該國性別成果逆轉的原因。Ece Kocabiçak 分析了土耳其性別體制中父權國家性質的變化。Alba Alonso、Rossella Ciccica 和 Emanuela Lombardo 對義大利和西班牙的分析表明，南歐不是一個統一的地區，兩個國家的性別體制在政體和民間社會的相互作用下出現了巨大的差異。Roberta Guerrina、Heather MacRae 和 Annick Masselot 將歐盟理論化為一種獨特的性別體制，它未能解決單一市場方案產生的性別和種族化的不平等，並因多重危機而加劇，而最近的危機正是疫情。■

來信寄至：

Sylvia Walby <[Sylvia.Walby@city.ac.uk](mailto:Sylvia.Walby@city.ac.uk)>

# > 性別體制是否出現了新變項？

Sylvia Walby, 倫敦大學城市學院, 英國, ISA暴力與社會專題組(TG11)共同主持人, ISA經濟與社會研究委員會(RC02)成員/前主席, 婦女、性別與社會研究委員會(RC32)成員

根據新出現的各種性別體制, 有三個問題需要被質疑、分析: 暴力、照護的不平等、危機的概念。

圖一來源: aesthetics of crisis/flickr; 圖二來源: John Twohig/flickr; 圖三來源: aesthetics of crisis/flickr。

我的同事和我在2020年《社會政治期刊》特刊中主張, 識別出新浮現的性別體制, 以及這些體制發展的軌跡, 對性別關係和社會而言, 都是至關重要的。雖然大多數人注意到的是不同性別體制間逐漸出現不平等的形式, 但仍有許多新的實踐慢慢浮現出來, 而這些實踐也許能供我們參考, 構思出較為平等的性別體制。因為疫情、脫歐、川普、經濟衰退等原因, 某些(而非所有)社會感到壓力, 因而使得性別不平等逐日加劇。與此同時, 也有許多集體回應的形式能減緩性別不平等。這種種回應也許是奠基於國家(如公衛)和奠基於非國家組織(如女性主義)。這種種因素使得暴力、照護、女性主義和性別、階級之間的交織性逐漸浮上檯面。在性別體制變項的辯論脈絡中, 這種種壓力與危機促成了什麼改變? 又給了我們什麼洞見? 若要將種種變革容納進性別體制變項的分類學中, 我們會需要什麼新的區分? 除此之外, 我們該如何理解種種在經濟、政體、公民社會和暴力等領域中導致不同軌跡的過程? 若要將現下的變革給化為理論, 我們還需要什麼? 「危機」和「轉向」等概念是否就已充足? 抑或是我們還需要新的概念來理解新的時空性? 在此, 我們能指認出三個比較廣的問題。

首先, 若要分析逐日加劇的不平等, 「新自由主義」這概念是否足夠? 我們該如何指認出右翼轉向以及與此相關的不平等, 又該如何將這些事件理論化? 在此脈絡下, 「保守主義」、「專制主義」或「法西斯主義」等概念是必要的嗎? 從「暴力增生」這面向來看, 性別體制的新變項便重新將暴力給理論化。我們是否仍有必要將國家視為



專制？新自由主義的理論架構能否容納這種新的暴力？與國家共謀的私人民兵之興起，是否需要以法西斯主義的概念為參照？公民社會和國家內部的持續討論是否足以阻止這種這類現象實現的可能？關於疫情：重構衛生服務的政治經濟嘗試，朝著營利性私人公司的方向前進，這現象是否不僅需要從新自由主義的角度探討，還需要更深入地探究性別與階級的交織性？

第二，要分析不平等加劇的情況，若只從社會民主的角度出發，是否不足以把握逐漸浮現出來的新實踐？這些新型態的社會民主性別體制，是否與民族國家有不同於北歐國家與民族國家的關係？區分社會民主體制的概念，如政體、國家、民族國家、非國家（平民、共同體、社群、鄰里、在地社群等），是否以不同的集體和團結形式介入？從疫情的角度來說，一方面，疫情危機再次顯示了以國家為基礎的社會民主形式在以國家為基礎的公共衛生抑制病毒時所扮演的要角。另一方面，國家在地方層級上，也需要知識和行動來部署有效的測試、追蹤和隔離政策。在很多時候，之所以無法有效處理病毒透過物理與社會接觸而傳播的問題，皆與提供和接受照護有關——無論這照護是否有供薪。至少在歐洲，這問題代表對照護議題中的性別辯論而言，疫情仍非關鍵要素。這便衍伸出許多問題：女性主義者的介入，對提供照護的性別體制產生了什麼影響？我們能如何把在照護關係中浮現出來的種種實踐給理論化？性別體制中的空間性和標度（scaling）若化作理論，會是什麼樣子？

第三，危機問題：現有的危機結果分類（恢復、加劇、轉變或災難）是否仍有所不足？將關鍵環節概念化為潛在的關鍵轉折點是否足夠？如何理解女性主義的不均衡影響？進入新的路徑相關軌道的關鍵轉折點或臨界點，通常被理解為「事件」，主要是基於它經歷的時間較短、發生的

空間較為集中。我們也許有可能進一步提出三種替代方案已表示區別：串流、催化和波動。「串流」指的是一系列的危機點，這種種危機可能會也可能不會透過社會的社會體系而串連起來；這已用於 2008 年金融危機和 2020 年至 2021 年的 COVID-19 危機。「催化」這個概念則指出這類危機的持續時間通常比事件還來得久；除了序列與串流之外，「催化」亦包含「加速」這個概念（而這概念則與「螺旋」概念息息相關）。理解 20 世紀中葉北歐國家社會民主形式的公共性別體制的發展時，「加速」概念甚為重要。「波動」則指出變革的動力（如全球女性主義的改變）會影響相對穩定的制度形式，且其結果奠基於兩者間的互動，也能透過「結構重整期」（rounds of restructuring）的概念，來更準確地理解種種變化的空間與時間面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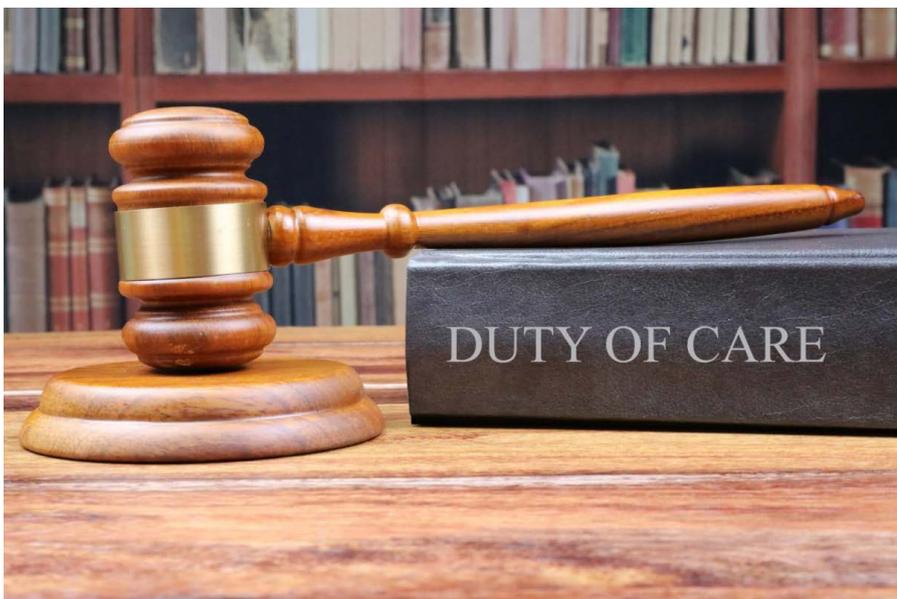
上述三個議題皆關乎 2020 年《社會政治期刊》中各種性別體制的辯論以及當代社會發展。■

來信寄至：

Sylvia Walby <[Sylvia.Walby@city.ac.uk](mailto:Sylvia.Walby@city.ac.uk)>

# > 一切盡在家庭： 保守的性別體制

Karen Shire, University of Duisburg-Essen, 德國, 經濟與社會 (RC02) 研究委員會副主席



當減少女性照護負擔的家庭政策被制定，照護的責任應該由誰承擔？應該由誰來為女性在家庭中提供支持，使其能更好地在工作與家庭之間取得平衡？

來源：Nick Youngson / 創用CC。

**性**別體制理論想像了公共性別體制發展下的兩條理想型路線。第一種是新自由主義的路線，由於女性也能平等進入競爭市場，使她們有機會獲得與男性平等的地位。但這一軌跡大多忽略了性別分工下的無酬勞動和勞動的性別隔離現象，如何使女性處於不利的位置。第二種社會民主路線則是將性別平等視為所有政策的目標。最重要的一點是，照護政策和其他的社會保障措施，讓就業保障變得更加平等，也保證了女性能夠平等地參與政治和經濟的領導階層。

就實際情況而言，美國最接近新自由主義的性別體制，而瑞典則最接近社會民主的理想型。這兩個案例在某一個方面是類似的——他們性別體制的發展鑲嵌於通往現代化的民主道路中。我和Kumiko Nemoto在《[Social Politics](#)》(2020)多樣化性別體制主題的特刊投稿中指出，以民主現代化歷史經驗為基礎的理想類型，忽略了正在經歷威權現代化的國家之特殊性。在我們對威權現代化的德國和日本，這兩個案例之中性別體制的歷史構成分析之中，我們主張家庭

法(family codes)是使女性在男性主導的家庭中處於從屬地位，並將家庭一家戶單位作為替民族主義和軍國主義利益服務的公共社會機構之關鍵。關於將性別階層合法地鑲嵌於家庭的類似論點，也在同一期《社會政治》特刊中針對中東和北非地區(Moghadam)、土耳其(Kocabıçak)和西班牙(Alonso 和 Lombardo)的其他威權現代化案例中提出。

## > 德國與日本的家庭政策

在1945年軍事失敗和遭受外國占領之後的民主化進程中，德國和日本對家庭法的改革主要是根據美國的自由市場模式建立國內的性別體制，但這並不完全一樣。家庭一家戶作為從屬於國家的單位，其內部的性別階層在福利和就業政策中被重構，性別學者稱之為男性養家模式(male breadwinner model)。1970年代的第二波女權運動實現了許多保守家庭殘餘形式的改革，例如繼承法和離婚法。但卻留下了家庭一家戶的照護及納稅責任，以及支持男性養家形式的社會政策。雖然不再是威權體制，但這些性別

>>

體制在 2000 年代仍算是保守。當時對於快速老齡化、低生育率和勞動供給下降的擔憂，使保守的政治政策與社會及自由民主力量相結合，改革了負責照護的社會組織並提高了女性的就業率。

然而，瑞典社會民主的性別體制並不是上述這些改革的範本，我也認為不是如此。與歐洲大陸的許多國家一樣，德國和日本的社會福利是透過扣除社會保險的收入來籌措，而且保障的範圍還擴大到受撫養的家庭成員。這種混合的福利形式使家庭中的女性能夠持續獲得無償的健康照顧，但這也讓像瑞典的這種稅收籌資和公共設施的解套方案在政治上無法實行。取而代之的是，減輕女性照護負擔的議題已被形塑為「家庭」政策，支持家庭女性使其能更好地平衡工作與家庭。在這兩個國家當中，家庭政策都干預了兒童和老年人照護的社會重組。然而，這兩個國家的家庭政策都沒有像瑞典那樣將護理社會化，也沒有去擾亂無償護理勞動在性別分工上的界限。

家庭政策取得了什麼成就？當重點放在最緊急的護理型態上——也就是嬰兒和無法自主獨立生活的老人——時，家庭政策的性別邏輯就變得很明顯。在德國和日本，家庭政策將這兩種型態的照護都「全留在家庭裡」。

擴大學前托兒服務的計劃未能涵蓋到大多數一至兩歲的兒童。在受到歐盟施壓下改革的德國，透過增加提供照顧的「日間保母」(day mothers)，緩慢地增加了這個年齡層的照顧比例(覆蓋率達到 34%)，但也同時強化了照顧幼兒的女性角色(儘管是照顧別人的嬰兒)。現在日本的女性，如果仍在等待托兒機構的名額，那她們可以將產假延長到一年以上。

在老年照護方面，兩國早在 20 多年前就引入了長期照顧保險。然而，為老年照護服務創造的新市場卻著重於給予資源，而不是將原本家庭成員提供的護理轉移至社會。國家支持擴大私人市場服務而不是去社會化護理工作，顯示了性別關係中新自由主義式的變化。

### > 尋找可行的社會民主替代方案

難道新自由主義的公共性別體制沒有其他選擇了嗎？要找出這個答案將會牽涉到瑞典社會民主性別體制形式的替代方案。在這次的探索中，至少我們知道出發點很明確：透過親密關係的社會重組和符合道德經濟、以性別平等為目標的新型態照護，來達成去傳統化及改變夫妻／生物家庭作為社會關懷基本單位的常態。

回顧德國和日本，1968 年學生和女權運動中重組親密關係的實驗，創意地使用了國家補貼和保險費，來創造家庭之外兒童和老人護理的替代形式。在德國可以看到，日間保母的合作企業、在租用空間的日間保父(day father)護理，以及老年人共同支付保險費以僱用自己照顧者的老年人共同生活形式等等的例子。在日本，由女性領導的非營利組織為有償女性和男性，提供高品質的護理和體面的工作。另一方面，也有越來越多的男性作為照護者出現在老年護理和學前托兒中。

尋找一種可行的社會民主替代方案來取代保守性別體制中的現代化性別關係，這很可能就是始於我們所知的「家庭的終結」。

來信寄至：

Karen Shire <[Karen.shire@uni-due.de](mailto:Karen.shire@uni-due.de)>

# > 我們能看到歐洲的性別體制轉型嗎？

Mieke Verloo, Radboud University, 荷蘭



關鍵字「#pieklokobiet」(女性的地獄)已經成為波蘭限制墮胎法案抗爭的象徵。

來源: LukaszKatlawa / [Wikimedia Commons](#)。

在過去的十年中，我們可以目睹到反性別運動的加速。這股趨勢正在整個歐洲蔓延開來，不但增加了反性別運動的參與人數，也擴大了那些對女權主義的未來來說非常重要的涉及議題；此外，還可以看見反性別運動中原先被動的策略變得主動，這種轉變實在令人擔憂。我們可以觀察到，這些運動針對的是一組特定的女權主義議題，特別是那些在 70 年代一連串女性主義議題中，被基進女性主義者優先考慮到的問題：去本質化的性與性別、身體和性的自主權、生育權、異性戀常規，所有的這一切都是歐洲日益增長的威權主義背景下發生。Agnieszka Graff 和 Elżbieta Korolczuk 的新書討論了 [民粹主義運動中的反性別政治](#)，書中精妙地分析了這一現象。我將在本文中探討，這些攻擊是否意味著歐洲性別體制的轉變，以及是否需要擴充原有的性別體制理論。

在 Walby 的性別體制理論中，性別體制是不平等的複雜系統。她關注政體、經濟、暴力和公民社會領域的特定型態，如何影響性別不平等。她區分了家庭和公共性別體制的不同，並比較新自由主義和社會民主形式中的公共性別體制。家庭性別體制和公共性別體制之間的不同在於政體上的差異：家庭性別體制的政體中，國家的介入較少，但是在家庭和親屬網絡中男性父權體制發揮了很大的作用；相對地，在公共性別體制中，國家的介入較多。接著，可以根據國家或國家機構如何建構階級不平等來進一步區分出兩種公共性別體制。就公共新自由主義性別體制而言，國家機構盡可能地為市場提供空間，使得資本主義制度能夠建構經濟體系。這導致了嚴重的階級不平等，並塑造了與這串體系交織的性別不平等。建立公共社會民主性別體制是為了減輕資本主義中嚴重的階級不平等，從而達到有一定基礎

水準的機會平等。尤其在勞動和照護方面的性別不平等，正是這種緩和體制需要達到的一部分。

我的論點是有關於四項對於性別體制理論的批評（參見2020年 [Social Politics](#) 性別體制特刊）。我關注 Walby 理論框架中為「家庭」提供一席之地的必要性，同時也提出了不同分析的切入點。

## > 家庭作為性別體制理論的一個領域——可能性和限制

Valentine M. Moghadam 確立了兩種公共的性別體制：新父權體制（neopatriarchal）與保守社團主義（conservative-corporatist）。新父權性別體制是國家利用保守的家庭法所打造的一種家庭父權體制，其中結合了限制女性參與經濟活動的資本主義形式。這種體制限制了公民社會，使女權主義團體難以持續發展，也讓社會缺乏充分保護受暴女性的法律。新興的保守社團主義體制則是展現了強大的女權運動，增加女性在專業領域中的可見度，也同時改革了家庭法。Moghadam 認為有必要將家庭視為一個領域，因為家庭法和改革是呈現這些性別體制如何出現和轉變的關鍵制度。最重要的是，她也關注政體和公民社會中各種非民主或民主程度不高的立場。

Karen Shire 和 Kimiko Nemoto 根據政體的民主或威權性質進行區分，也強調了家庭政策的重要作用。他們觀察到，保守的性別體制建構了作為公共領域的家庭，並透過家庭政策進行轉變，這加強了既不是新自由主義也不是社會民主主義的性別分工。這些家庭政策結合了支持婦女就業與提高生育率兩個層面。他們表示，國內的性別體制可以透過保守、非自由的方式走向現代化。這不但以勞動和照護組織為特點，還同時控制了婦女的生育能力。與前文提到的 Moghadam 類似，他們都在民主與專制的構面上區分性別體制，也牽連於不同的變化途徑：威權體制由上而下，民主體制由下而上。

Ece Kocabiçak 同樣主張，我們需要更加關注從家庭性別體制到公共性別體制的轉變過程中，以性別為基礎來維持家中父權對勞動力剝削的剝奪形式。她觀察到現代家庭的父權制將女性排除在領薪工作之外，在剝奪的同時還增加了她們對家中收入的依賴，從而維持家中的父權對勞動力的剝削。

由於西班牙在性和生育方面的抗爭，對於理解性別體制的動態具有重要的意義，Emanuela Lombardo 和 Alba Alonso 也認為有必要對情感投注層面進行理論化。這些抗爭是反性別運動的核心，其阻礙了性別體制進一步往女權主義的方向轉變，這股力量甚至可以扭轉過去取得的進展。

所有這些學者都試圖將「家庭」的問題切入 Walby 當前提出的四個面向，但卻因為家庭主要都集中於勞力—照護的劃分之中而難以辦到。此外，也不足以涵蓋那些從社會如何建構身體、性和親屬關係出發的性別不平等面向。

總而言之，目前在公共新自由主義和社會民主性別體制之間的各種性別體制的表述，都不足以掌控當前的反性別運動以及隨之形成、欠缺進步的性別關係形式。這種轉變已經發生在波蘭和匈牙利，限制了生育權和性自主權，並阻礙了建立家庭和關係的性權利。這種轉變正在迅速擴散到其他國家和各式各樣的政治行動者上。正統宗教和極右翼行動者正組成了一個強大的聯盟來推動這項轉變，這會是新父權體制的現代公共形式嗎？

這是一場嚴重的性別體制轉變，但只有當我們能闡明出一個以身體、性和親屬關係為中心的全新成熟領域時，它的醜陋才會顯示出來。■

來信寄至：

Mieke Verloo <[mieke.verloo@ru.nl](mailto:mieke.verloo@ru.nl)>

# > 公共性別體制： 聚合分歧

Heidi Gottfried, Wayne State University, 美國, ISA經濟和社會(RC02)、勞工運動(RC44)、婦女、性別和社會(RC32)委員會成員。和 Karen Shire, University Duisburg-Essen, 德國, ISA經濟和社會(RC02)委員會副主席



雖然日本和德國的區域再生產重組在重要方面有所不同，但移民在這兩個國家的照護工作規劃中扮演著重要角色。  
來源: Pekka Nikrus / flickr。

隨著德國和日本的奇蹟式增長和經濟擴張，女性在高等教育方面有所進步，但針對她們就業模式的轉變依然有限，性別間持續存在著巨大的薪資差距、無償照護的負擔，在母親角色從事兼職工作的高比例上就能看得出來；此外，這個模式更在疫情期間越演越烈。在一個全球規模下對社會再生產重新洗牌的世界中，針對組織照護的政策在當代性別體制之間造成了「聚合分歧(converging divergences)」，同時在女性扭轉再生產勞動中的性別劃分時，又製造了新的分歧。特別是在快速高齡化的國家，低薪移民勞動力的需求不斷增加，促進了區域和全球在社會和政治經濟層面的整合，同時帶來階級、性別和種族／公民層面的不平等現象之間更加緊密的交集。

## > 解構照護工作

德國和日本的改革無法充分擴張嬰兒托育機構，導致持續將嬰兒托育交由私人家庭。兩國生育率的下降，一部分是由男性養家活口的就業體制造成的，這導致人口快速老化，對老年人照護的需求隨之增加。兩國內新的社會政策是長期保險計劃，它們以大致相似的方式將老年照護轉嫁到私領域。兩國透過保險費部分資助服務，進而助長了低薪、半專業化的照護服務得以擴張。

橫跨整個歐盟，在歐洲就業策略及性別目標的驅使下，至少對三歲以上的兒童而言，育兒大多變得更加社會化。然而，照顧三歲以下的幼兒，多半依然是家務事。男性在家務勞動方面的作為缺乏明顯變化，促使歐盟嘗試將更多女性的無償

>>

家務勞動轉向有償市場服務。此外，無論性別體制是否具備典型的社會民主主義特徵，絕大多數有償家務和照護勞動都還是由移民女性負擔，她們面臨懸殊地低薪與不穩定的就業條件。社會再製的重組與以下兩者有關：婦女退出私領域以便大量從事有償工作，和人口變遷脈絡下，為求國家經濟增長而推廣女性勞動參與的「家庭」政策（如僱用家務勞工的稅收抵免）。因此，國家增長策略更加緊密地連結超越國家的、區域性的再生產整合。

### > 地區差異

社會再生產的區域重組中，亞太地區以日本為例，歐盟以德國為例，在幾個重要環節各有所不同。歐盟的服務和流動自由，創造了徹底自由化的貿易和勞動力流動基礎設施，儘管有證據說明，東歐移民早在新成員國公民可以合法在德國工作之前，就已經在德國照護部門中發揮作用了，說明功能上是相同的，而非根本上的差異。東南亞國協正在消除其會員國間一些技術勞動力流動的障礙，然而該區域的運作與歐盟截然不同。日本依賴雙邊協議來實現類似的社會再生產重整。用經濟夥伴關係的行話來說，日本透過發動貿易協定，創造了新的照護勞動力流動走廊；事實上，照護勞工正是這些協議中移民條款針對的主要對象。日本最顯著的勞動力來源，如菲律賓、印尼和越南，透過殖民歷史、日本作為該地區主要金援國的政治影響力，以及日本作為最大外國投資者的地位，銜接了過往的地區鏈結。

不同於德國，日本謹慎地透過達成雙邊協議、將照護工作分類為技能或非技能，來擴大移民照護人員的數量。它的勞動力輸入策略沒能填補照護人員長期勞動力短缺的問題，一部分歸因

於對移民的嚴格控制、獲取證照的高門檻，以及獲得公民身份的管道限制，一再限制了移民勞動力流入日本。日本政府依循舊慣，將自己置於中介的中心，不僅在雙邊協議的談判中扮演規則制定的代理人，還充當勞動市場仲介，管理他國勞動力在自己區域的流動。歐盟的自由流通特性緩解了德國鄰國的跨境流動。早期的限制意味著移民看護勞工要不是以自僱者身分（在歐盟的服務自由原則下）進入德國，要不就是以未登記的勞工身分進入德國。在這個早期階段，移民在私人家庭中工作，要不是沒有滿足基本的勞動條件（如果是自僱者身分），就是苦無任何申訴管道（如果沒有登記）。與歐盟其他成員國一樣，這種照護勞動力進入德國的形式，使代理服務得以蓬勃發展（主要位於東歐成員國）。解除限制使照護人員處於不穩定的自僱／仲介服務關係中。藉此，移民照護勞動已被「做」成一種不穩定的就業形式。

區域化和全球化可以是一股正面的力量，甚至為政府和社會中的女性主義行為者提供新的舞台，以便動員有力的運動，使性別平等政策能跟上國際趨勢。儘管如此，在區域和國際層級的政策必須交由國家層級的政治行為者制定。跨國組織和國家政府之間潛在的緊張關係阻礙了各國之間原可輕鬆施行的政策，這一點從各國政府對 COVID 的反應中明顯可見。如同 COVID-19 的危機，可能會導致社會體系發生相應的變化：新的社會共識或許能促成照護工作的重新評估，並使政策更偏向社會民主原則，私領域家庭中照護勞動的加強，也可能強化婦女的重新傳統化，以及階級、種族和公民身份的不平等。■

來信寄至：

Heidi Gottfried <[ag0921@wayne.edu](mailto:ag0921@wayne.edu)>

# > 性別體制、政治 與世界體系

Valentine M. Moghadam,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美國, ISA 女性、性別社會研究委員會 (RC32) 成員

**性**別體制是由 Sylvia Walby 提出的宏觀社會學概念，其理論化與分析多針對國家層面。此概念主要運用於經濟高度發展的資本主義民主國家，這些國家與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及其金融市場高度融合。至今的案例研究包括英國、美國、西班牙、日本和德國。然而，我們開始看到運用在低度發展地區的分析。這些地區有民主政體，也有威權政體；它們不是高度依賴世界經濟，就是低度相容。在本文中，我將著重在伊朗和突尼西亞，並從背景開始說明。

針對以色列 (Amalia Sa'ar)、土耳其 (Ece Kocabiçak) 和非洲西北部 (Maghreb) 的阿爾及利亞、摩洛哥和突尼西亞 (本文作者著) 的研究表明，在考量國家的特殊性與國家內的差異進行必要的調整後，性別體制的概念可以延伸到非西方脈絡之地區。Sa'ar 使用「父權制性別契約 (patriarchal gender contract)」的概念 (我在 1998 年的一本書中介紹過) 來描述巴勒斯坦-以色列婦女勞動力融入新自由主義經濟的停滯狀態；研究結果指出以色列主要是以家庭為中心的性別體制，與規模較小、以公共為中心的類型並存。Kocabiçak 主張，土耳其的性別體制在前現代和現代形式之間，可能隨地區或時間的推移而有所不同。Aili Mari Tripp 在她最近的著作《尋求合法性 (Seeking Legitimacy)》中雖沒有使用性別體制的概念，但她將阿爾及利亞、摩洛哥和突尼西亞等西北非國家與其他中東和北非 (MENA) 國家進行比較，確認了我對中東和北非次區域的討論——從「新父權制」轉變到新興的「保守-統合主義」性別體制。Rania Maktabi 雖然沒有運用性別體制的理論，但以性別公民體制區分北非、黎凡特 (地中海東岸) 和波斯灣酋長

國。在我自己的作品中，我叩問關於非西方或非資本主義現代國家 (如：共產主義和威權主義脈絡下)，同時也關注晚近民主化的非洲西北部國家 (特別是突尼西亞和伊朗) 新興的性別體制。

在所有情況下，女性主義理論對於父權體制演進和性別體制建立過程中的進展和停滯 (如果不是倒退) 都同樣地關注。因此出現的一個問題，是性別體制是否不僅是由國家的制度和階級結構所構成，可能還取決於它們所在的經濟區域——核心、邊陲和半邊陲，正如世界體系學者所闡述。以此規模理論化性別體制可能是分析的第一步，辨別差異、動態與發展；擴散與輻合；趨同與趨異；及改變和倒退的驅動因素。

## > 全球南方的性別體制——概念討論

為了將此概念應用擴展到全球北方之外，我認為有三個概念上的討論是重要的。第一點涉及私人父權體制 (國內或前資本主義的性別體制) 持續存在的特性和程度、新興或已建立的性別體制 (保守派 vs. 新自由主義或社會民主主義) 的適當名稱，以及家庭作為一個持續且顯著的機構。

第二點關乎規模。在我與兩位關注首都 Sanandaj 的伊朗庫德族社會學家合著的一篇有關伊朗庫德斯坦的文章中，家庭仍然是一個重要的制度，在伊朗更廣泛也更集中化的新父權性別體制中。制度是否會因規模的差異而有不同的運作方式？

第三點則是關注性別體制轉變過程中的驅動因素和行動者，及停滯或倒退其背後的原因。例如，在我關於非洲西北部的性別體制轉變的研

# 「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概念，應該是我們理解性別體制的前景與動態的切入點，包括不同層級的制度組合。」

究中，我認為女性主義動員是變革的關鍵驅動力，但我也指出經濟危機阻礙了更多進展——尤其在突尼西亞民主化方面。

這三個議題是相互關聯的，因為驅動因素和行動者可能處於不同的規模、制度可能受到全球、國家和地方動態的影響。我的核心論點是，資本主義世界體系——資本主義市場和國家間關係的高度不平等和階層化結構——應該是我們理解性別體制的前景和動態的概念切入點，包含了不同規模的制度構成。

## > 伊朗和突尼西亞的性別體制—— 運用世界體系分析

從經驗材料中對兩組中東和北非共和政體中的中產階級（包括受過教育和具前景的女性人口）的關注，我藉以探索這些概念間的關係。一組是威權、石油資源豐富但受到美國制裁的伊朗；另一組是民主化但經濟蕭條、負債累累的突尼西亞。他們有不同的政治、經濟和公民社會，但關於家庭的辯論卻相似。制度，以及其所源自的性別體制，不僅受到內部因素和力量的影響，也極易受到階層化的世界體系運作的影響。

我認為，性別體制是世界體系進程的產物，這些進程會影響國界內和跨國界的行動者和制度，從而促進或阻礙性別平等。在伊朗的案例中，一個新興的半邊陲國家挑戰了世界體系的霸權，招致了經濟和金融懲罰。這反過來又加強了國內的右翼力量，女性參與和婦女權利的進展造成了阻礙和倒退。包括最近一項備受爭議的官方決定：只向父親發放孩子的成績單。在突尼西亞的案例中，廣受推崇的民主轉型及更加平等主義的新興性別體制也受到威脅，這源於該國的小型經濟、與全球商品鏈的淺薄的連結，以及對外部投資和貸款的依賴。具體案例包括女性平等繼承的相關討論僵局和無作為，以及最近有爭議的總統干政。這讓女性主義倡議者非常失望。伊朗和突尼西亞，這兩個處於邊陲與半邊陲之間的全球南方國家，闡明了世界體系進程——國家間體系內的霸權政治，以較小經濟體在世界經濟中的弱勢處境——在性別體制上的影響。■

來信寄至：

Valentine M. Moghadam

<[v.moghadam@northeastern.edu](mailto:v.moghadam@northeastern.edu)>

# > 土耳其父權國家的 決定性因素

Ece Kocabiçak, The Open University, 英國



針對土耳其退出保護女孩／女性免受一切形式暴力的《伊斯坦布爾公約》，女性和LGBTI+社群提出抗議。

來源：[Yagmurkozmetik / Wikimedia Commons](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Yagmurkozmetik)

**在** 探討社會轉型時，性別、階級和種族不平等皆是重要面向；不僅如此，多樣的性別體制理論也有助於評估國家父權體制的特徵變化。本文透過檢視土耳其父權國家的決定因素來延伸對性別體制理論的討論。以土耳其退出《伊斯坦堡公約》（一項針對婦女和家庭暴力的人權條約）的案例，幫助我們瞭解多國家議程和去民主化進程之間的相互作用，多大程度提高了男性的集體談判能力，作為一個基於性別的社會建構群體。

## > 兩種形式的父權國家特徵

基於性別體制理論，我認為社會中的性別、階級和種族的主導群體對國家具有強大的影響，因此，導致了多個國家議程之間的相互作用。根據 Sylvia Walby 的說法，性別排除策略能佔優勢是與家庭內的性別體制有關；而性別隔離和從屬關係則與新自由主義或社會民主形式的公共性別體制有關。借鑒於她的分類，我將父權體制國家的特徵以兩種形式概念化：家庭父權制國家將婦女的勞動侷限於家務生產（包括照護工作）

>>

中；而公共父權制國家(the public patriarchal state)利用不同程度的商品化和去商品化(女性在家庭生產的商品和服務)，以持續讓女性負擔有償和無償的雙重勞動。前者維持性別排除策略，後者則在經濟、政治、公民社會和暴力等面向的制度上約束性別隔離和從屬關係。

由於全球南方的國家形成經常是由多元群體的政治行動者所組成，上述概念框架在分析上更為相關。正如我在其他地方所論證的那樣，土耳其的父權政治行動者不僅限於男性家戶長，還包括農村和城市地區的男性小生產者。此外，在公共決策中，在反民主政權維持著相當大的性別落差的情況下，特定精英男性群體就能繼續影響政權領導。這又反過來地增加男性的談判能力。在提到這群精英男性時，我提出了「統治的男性(men-of-the-regime)」的概念。

我的數據分析表明，自2000年代以來，土耳其的公共父權制與家庭父權制之間存在著衝突。這些衝突的特徵也許在其他國家中也能找到，但在土耳其，朝向公共父權制國家的轉變仍不大，其規模不足以挑戰家庭父權制的主導地位。國家在經濟領域的干預措施鼓勵教育程度相對較低的城市婦女留在家中提供無償照護工作，同時讓農村婦女在中小型農場擔任無償家庭工人。在公民社會領域內，最近成立的反民主政權(自2014-15年起)將婦女排除在公共決策和政治代表之外，並壓制社會運動；與此同時，婦女對其性行為的控制，包括她們的生育能力，受到國家驅動的反同和鼓勵生育政策所規範。若仔細研究該國對性別暴力的干預，可以發現女性被困在暴力的異性戀家庭環境中，因為該國限制了女性選擇替代方案，並容忍男性對單身、分居或離婚女性及LGBTQ+族群的暴力。

### > 土耳其退出《伊斯坦堡公約》

藉由關注土耳其退出《伊斯坦堡公約》，我調查了父權體制行動者利用土耳其穆斯林種族主義國家議程來維持家庭父權制國家特徵的程度。我的評估表明，最初，在2015至2018年間，某些男性群體組織起來反對禁止童婚、獲得贍養費和規範兒童監護權的法律規定。與《公約》有關的第6284號法律也在此期間備受檢視。這些團體透過

在社群媒體上建立各種討論社團、舉辦假消息的宣傳活動和組織街頭抗議，聲稱他們是上述規定的受害者。他們最初的倡議活動也受到「統治的男性」的支持，包括評論員、記者、學者、宗教教派領袖和各個政黨的男性政治家。

儘管如此，在2019年重新進行戰略定位之前，男性最初的動員能量仍然有限。雖然在2019年前沒有提及《伊斯坦堡公約》，這些男性已經轉移焦點，並重新架構了他們的要求：(1)不僅是同性關係，女性獨立於男性也嚴重的威脅了家庭結構的土耳其性(Turkishness)和穆斯林性(Muslimness)；(2)強調這種家庭結構，在物質上和社會上，對土耳其和穆斯林人口存續的重要性；(3)重複強調「西方意在摧毀土耳其」這種眾所周知的錯誤認知。隨著採用這一波新戰略，這些「普通」男性和「統治的男性」有效地合作並加速他們的影響，不僅在正義與發展黨的領導上，也影響了主要的聯合黨(民族運動黨)和反對黨(幸福黨)。面對女性的強烈反彈，國家退出的決定並不那麼簡單。儘管如此，2021年3月，Erdoğan 正式宣布退出，理由是該公約被用來使同性戀正常化，而這與土耳其社會和家庭的價值觀不符。

《伊斯坦堡公約》的案例表明，儘管有「統治的男性」的努力，男權運動最初(2015-2018)仍未能增加其對國家的影響力。在這個早期階段，女性的強烈抵抗阻止了他們的要求。隨著土耳其穆斯林種族主義議程的採用(2019年以來)，「統治的男性」在增加父權體制行動者的影響力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從而增強了家庭父權制。這份評估對性別體制研究的貢獻在於：(1)探討構成父權政治行為者的多元群體，特別是在全球南方的背景下；(2)探索多個國家議程之間的相互作用如何提高男性的集體談判能力。■

來信寄至：

Ece Kocabiçak <[Ece.Kocabicak@open.ac.uk](mailto:Ece.Kocabicak@open.ac.uk)>

# > 存在一種南歐的性別體制？

Alba Alonso, University of Santiago de Compostela, 西班牙; Rossella Ciccia, University of Oxford, 英國; ISA經濟與社會研究委員會(RC02)、貧窮、社福與社會政策委員會(RC19)成員; 以及 Emanuela Lombardo, Complutense University of Madrid, 西班牙



西班牙和義大利的性別體制經常被認為是較為保守的。然而，在過去的幾十年裡，這兩個國家已經顯示出混合的跡象，並變得越來越不一樣了。

來源: Granata92 / [Wikimedia Commons](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Flag_of_Spain)

持和反對性別平等的行動者群、有組織的宗教、女性政治代表權以及普遍的性別角色觀念，都是構成國家女性主義和女權運動元素，透過在性別體制軌跡中創造特定相互作用的組合以產生多元變化。

我們的研究挑戰了這個適用於該地區所有國家的「南歐性別體制模型」。考量性別平等制度化的歷史遺緒後，在對2000年代的義大利和西班牙的性別平等政策軌跡所進行的分析中，指出這兩個南歐國家不能與該模型混為一談，因為它們的性別體制存在顯著的差異。西班牙的性別體制變得越來越公共，並依執政黨的色彩，在社會民主進步和新自由保守形式之間游移；但義大利的性別體制卻更朝向家庭並更加保守。

**我**們要如何理解南歐國家的性別體制的差異？是什麼解釋了性別體制的不同路徑？西班牙和義大利經常被歸類為家庭模式或保守模式，因為它們的威權主義歷史和具家庭主義性質的福利國家制度，並使性別不平等和女性參與公共領域更加根深蒂固。然而，在過去的幾十年中，這兩個國家的性別體制已經出現混合化的跡象，且兩國越來越不同。西班牙正在走向更加公共的形式，而義大利變化的速度要慢得多，並朝向更大程度的私有化發展。

我們認為，政體和公民社會進程是性別體制變革的關鍵「引擎」。過去文獻中，國家女性主義相關研究分析了政體與公民社會之間的動態。其中，對西方後工業民主國家的研究探討了國家女性主義在多大程度上促進了女性利益的民主和實質代表權。國家女性主義，在性別政策辯論中，與女權運動和婦女政策機構之間的聯盟存在多大程度的相關性。政黨制度的特徵、制度遺緒、支

## > 政體和公民社會的動態

性別體制的變化受到政體和公民社會各自和兩者間動態的影響。影響我們評估兩國政體中的性別體制的因素包括：(1) 政黨體系：義大利的政黨體系較西班牙更具衝突性，來自於義大利主流的中間偏右政黨；西班牙的中間偏左政黨在性別平等問題上較為積極；激進的右翼民粹主義政黨日益強大——在義大利是自1990年代來便茁壯且具政治影響力，但在西班牙則是近期才出現；(2) 民主的深度：義大利的女性政治代表率非常低——直到2018年仍只有11%——而西班牙自2007年以來便達到40%左右；(3) 宗教有組織的干預政治：梵蒂岡及其公民社會和政治盟友在義大利比在西班牙更為直接影響國家，對其性別平等造成不利影響；(4) 國家女性主義和天鵝絨三角（即政策制定者、女性主義學者專家以及女性主義運動之間的互動）：與西班牙相比，義大利在性別平等制度化上較弱，在女性主義運動者、立法者、女性

>>

政治人物和學術界之間的聯盟也較弱；(5) 聯邦制在西班牙是一股進步的力量，能引起地區間、地區與中央之間的性別平等政策創新，而義大利並非如此；(6) 與西班牙相比，義大利的福利制度的家庭主義特徵更為顯著。

對於公民社會，影響我們評估的關鍵因素如下：(1) 婦女運動的類型：與西班牙相比，義大利的婦女運動經常是基於差異而不是基於平等出發，並且更少以國家為導向，在西班牙，左翼政黨中的女性主義者和女性政治人物的存在確保了性別平等政策的持續性；(2) 反性別運動的力量及正式政治行動者的支持：這在義大利比在西班牙更大，因為運動與政府中的激進右翼民粹主義政黨間存在重要連結，而在西班牙，這種政治連結近期才開始出現；(3) 知識：西班牙的民意朝向更世俗化、對於性別角色更進步的觀念發展，但在義大利，政治文化和社會仍是盛行保守主義。

總體而言，推動性別平等政策的因素也更大程度的對西班牙的公共性別體制施壓，而義大利的公共且進步的性別體制發展則面臨政治和公民社會中具有敵意的保守和反性平力量。關於家庭、就業和政治中的性別角色的保守觀念持續地影響義大利傳統家庭結構，而西班牙正在走向雙薪模式。有組織的宗教對義大利的性別體制也有更為不利的影響，而西班牙社會的世俗化程度更高，讓它們在性別平等方面取得了更大的進步。

這份比較研究藉由關注政體和公民社會領域中引起變革的因素間的相互作用，得出了義大利和西班牙存在不同性別體制的結論。未來的研究將需要考慮與其他關鍵面向的相互作用，例如經濟、暴力、知識以及身體和性，以更全面地了解南歐性別體制之間的差異，這些差異將挑戰過往普遍的、不精準的類型學。■

來信寄至：

Emanuela Lombardo <[elombardo@cps.ucm.es](mailto:elombardo@cps.ucm.es)>

# > 太過遙遠的危機？ 歐洲後疫情時代的性別體制

Roberta Guerrina, University of Bristol, 英國; Heather MacRae, York University, 加拿大; Annick Masselot, University of Canterbury, 荷蘭

與以往的危機相比，這場疫情更突出了女性在維繫歐盟經濟和社會結構上，所發揮的關鍵作用。  
Arbu 繪製。



在 整個世界都放緩腳步下，2020將為人們所回憶。對許多評論家來說，疫情的蔓延使既有的社會、政治和經濟確定性，以及領導全球政治經濟的規範都陷入了混亂。有些人則認為這場危機是一個轉機，讓我們反思對地球的影響，以及與社會政治結構的相互關聯性。對於已經被其他各種危機搞得焦頭爛額的歐盟來說，這場疫情代表了一種生存困境：這究竟是一場打開歐盟解體之門的危機？還是一個機會，使我們設想一個嶄新的、更具包容性的共同體？對於我們的分析而言，更重要的是，歐

盟作為後疫情時代的性別行動者，它的角色是什麼？並且，歐盟性別政治的未來是什麼？

歐盟境內危機所塑造的性別與種族化後果，以及歐盟作為性別行動者的角色，與其機構對平等論述的戰略部署，都有充分的記錄。目前的多重危機，即多重和反覆的許多危機合併成一種「存在狀態」的過程，其對歐盟性別制度的影響凸顯了一個關鍵的時間節點，或許比以往的那些更為重要。在 Sylvia Walby 看來，在多重危機的壓力下，儘管在其他方面有相反的傾向，歐盟的

性別制度在某些方面正從社會民主主義走向更加新自由主義的公共性別制度。就我們的分析而言，這種多重危機代表了對歐盟的價值與認同的考驗；特別是對與歐盟境內、外部夥伴以及鄰國的，作為性別行動者的既定角色層面。

### > 危機的漫長歷史

歐洲整合的歷史，正是一篇有關危機的故事。這些危機和危機後的解決方法通常被描述為，開啟了經濟機會並且創造了新的政治空間的神話。作為歐盟學者，我們瞭解到，歐洲整合的計畫起源於20世紀歐洲複雜的地緣政治動態。就像一隻從飽受戰爭蹂躪的歐羅巴灰燼中浴火重生的鳳凰，歐盟協助並確保了歐洲大陸70年的和平。這當然是一部片面的歷史。它忽略了歐盟在處理巴爾幹半島衝突時的失敗，以及單一市場對集團內較弱經濟體的影響。此外，採用交織的女性主義視角，可以發現這種機會並不是每一個人都能平等地獲得的。相反，連續的危機使人們對社會正義和平等的關鍵問題進一步擱置。

疫情只是一系列危機中最新的一個。也許比以前的危機更尖銳的是，疫情突顯了私領域和正規經濟中，性別與種族化的勞動分工。瞭解後疫情時代復原計畫的重點，使我們能夠評估關鍵的優先事項和對未來經濟以及性別制度的願景。對我們來說，這裡的問題是，Walby 所概述的性別制度變化的平衡，究竟是走向一個更不民主的制度，還是為想像一個更具包容性的未來創造空間？因此，2020年後的解決方案必須在2008年的歐元危機（以及相關的撙節政治）、地中海持續的人道主義危機、日益危險的移民路線，以及最後英國脫歐和整個歐洲大陸反歐洲民粹主義運動的興起，所定義的多重危機歷史脈絡下來理解。

### > 疫情下的性別體制

在疫情危機的第一階段，重點是全歐洲的應對和國家健保體系的復原力。醫護人員、醫生和護士被描述為英雄，他們在艱苦的環境下工作，被稱為抗擊病毒的新前線。在這個階段，公共衛生變得安全化。由於許多家庭將工作和生活重新安排在家中進行，學校教育和照護的負擔主要落

在婦女／母親身上。事實上，婦女繼續提供大部分無償的、看不見的、但又是必不可少的照護工作，支持著整體經濟。因此，全歐洲的趨勢是朝著越來越私人化的性別制度發展，重新賦歸了傳統的性別分工。

因此，旨在防止疫情傳播的公共衛生措施，突顯了鑲嵌在新自由主義性別制度的平等模式中，最根本的失敗之一。注重在投入勞動力市場和啟發學齡兒童的婦女，對於挑戰家庭中根深蒂固的，照護工作的性別分工，幾乎沒有任何作用。這次危機比以往的更突顯了婦女在經濟中發揮的關鍵作用，以及社會再生產對正規經濟運作的持續重要性。許多「在前線與病毒戰鬥」的關鍵勞工，如清潔工、護士、看護和醫生都是女性。在許多層面，對疫情的政策應對凸顯了，與男主外女主內有關的價值是多麼的歷久不衰。諷刺的是，在疫情期間，支撐歐洲社會的工作，就是婦女所做的那種不受重視、不受尊重的工作，而這種工作在官方的經濟統計中很容易被忽視，也被歐盟的性別體制所掩蓋。2019年歐盟工作與生活平衡方針的通過，似乎對減輕全球疫情期間照護者雙重負擔的負面影響沒有什麼作用。然而，它是將「歐盟護理政策」納入歐盟後疫情復原計畫的平臺。

多重危機對歐盟的性別體制會有什麼影響？歐盟委員會的復原計畫，使我們有機會思考歐盟將成為什麼樣的組織。這個願景包括一個明確的野心，和一個同樣雄心勃勃的預算，以支持「公正轉型」和復原。而這些尚未解決的問題，將會涉及這項投資對歐盟性別制度及其組成領域的影響。■

來信寄至：

Roberta Guerrina

<[roberta.guerrina@bristol.ac.uk](mailto:roberta.guerrina@bristol.ac.uk)>

# > 玩火自焚：陽剛氣質的社會學

Raewyn Connell，榮譽教授，University of Sydney，澳洲，女性與社會(RC32)、概念與術語分析(RC35)研究委員會成員



悉尼大學校園中的吉爾伽美什雕像。其描繪的吉爾伽美什，在與獅子戰鬥後毫髮無傷，並將獅子提在手中。  
來源：Gwil5083／創用CC

**男**性如何在社會中被定位？對於「陽剛氣質」這個議題的討論，絕不是什麼新鮮事。早在四千年前，蘇美—阿卡德文明的《吉爾伽美什史詩》，就記載了兩種截然不同的陽剛氣質：高貴／忠誠的吉爾伽美什，與野人恩奇杜。在荷馬撰寫的希臘文學經典《伊利亞德》中，個性帶刺、戰力高強的阿基里斯與他衝動且失敗的戰友帕特羅克洛斯之間的愛情，也正是荷馬故事的核心。

即便這些關於權力、暴力與戰爭的故事，是根植於深厚的文化背景，當代的陽剛氣質社會學並非以這類神話傳說為基礎。如同南非心理學家Kopano Ratele所言，「傳統的」陽剛氣質經常被過度簡化——所謂的傳統，是多樣、複雜且具爭議的。

## > 開端：從性角色到結構理論

陽剛氣質的意義，會隨著殖民行動、大規模失業等社會危機，以及婦女運動等事件的發生而受到挑戰。由此視角出發，精神分析對陽剛氣質提出開創性觀點（如佛洛伊德、榮格、阿德勒等人），和中歐女性參政運動、出現「新女性」概念的時間點互相交疊，也是很合理的。畢竟當時正逢德國女性主義教育家Mathilde Vaerting 提出了革命性的、第一個較為完整的性別社會學理論。

當代陽剛氣質研究的另一個轉折點，是1970年代的全球婦女解放運動。當時，主流的社會科學框架是以「性角色」(sex roles)的概念來理解性別。此概念直到現今仍常見於傳播、社會心理學，以及教育、健康等應用領域。在這個概念下，陽剛氣質被認為是在學習特定性角色的過程中發展出來的，例如年輕男性抽菸、糟糕的飲食、發生交通意外等等，即被視作依循男性角色範本而出現的行為。

性角色的概念，對於性別的社會分析而言，可以說是提供了一種實用的、基礎的理解視角。對性別特質的解釋，得以在基因決定論或是神造論之外，有了另一條替代方案。這也使得人們開始關注雙親、大眾媒體等行動者，如何影響了社會中性別範本的形成

>>

與學習過程。這樣的觀點背後隱含的是，性角色的內涵，事實上是可以隨著社會範本的變動而改變的。1970年代，許多女性主義團體即嘗試透過行動，改變女性角色的範本；亦有以改變男性角色為行動目標的社會運動，試圖在女性解放的同時，追尋「男性解放」。在美國，這樣的政治理念更促使一個全國男性進步訴求組織於1981至82年的成立。

然而，性角色此一概念的重大缺點，很快地被人們意識到——這樣的理論預設了任何社會中，皆存在著「唯一的」男性角色與女性角色。許多經驗研究強調社會中存在著多種不同的性別形式。角色理論並不能解釋存在於全球各地的性別差異，例如特定性別於財富、收入、地產上的不同；其頂多只能對經濟不平等的分析帶來調整。性角色理論於是在權力與暴力議題上，面臨了重大困境。

至1980年代，許多國家的社會科學家，嘗試超越前述角色／規範的理論取徑。他們將性別視為一種鉅觀的社會結構，並將經濟、國家與家庭、個人之間的關係一同納入討論。於此同時，伴隨著同志、婦女解放與公民權利等社會運動帶來的理念與觀點，也使得更為複雜的陽剛氣質圖像逐漸被建構出來。此時的社會學家更借鑑於精神分析、民族誌、量化研究等領域。

1985年，Sigrid Metz-Göckel 和 Ursula Müller 發表《Der Mann》，針對德國男性的生活與觀點進行全國調查。同年，澳洲的研究團隊發表《走向新的陽剛氣質社會學》宣言，並在美國的行動者組織會議上進行了三場「男性研究」的專題。在此之前，Ashis Nandy 也在印度出版《親密的敵人》(1983)一書，對殖民主義中陽剛氣質的建構提出精闢的分析。

## > 全球地景

在不到十年間，即出現了一個新的研究領域，其有許多不同的名稱——相對於女性研究的「男性研究」、德文中意指「研究男性」的「Männerforschung」，又或是「陽剛氣質研究」、「男性與陽剛氣質的批判研究」，以及其他類似的詞彙等等。這個研究領域的發展最初是以富有地區的大學為中心，例如德國、斯堪地那維亞、英國、美國、澳洲等。由於這些大學並沒有專精男性研究的系所，陽剛氣質研究的教學是在廣義的性別研究學程，或是社會學、歷史學、文學與其他人文科學領域中的性別課程中進行。

1990年代後，相關專業期刊一一創立，至今已八個學術期刊以陽剛氣質為主題，發行於五個國家。也有人嘗試建立專門研究中心，不過其中僅少數得以存續。不過1990年代以來，研討會相對頻繁地舉辦。1992年，在澳洲Michael Flood 引領下，更有開放式線上書單創立，其中收錄極大的文獻書目數量。(網址：[www.xyonline.net](http://www.xyonline.net))

陽剛議題的討論一開始就是全球性的，也快速地形成了一個以全球為範圍的研究領域。世紀交錯之際，舉凡印度、智利、巴西、美國、英國、德國、南非、澳洲、日本與北歐國家等地區，針對陽剛氣質的研究，不只是以獨立文章的形式，也以學術合輯的方式陸續發行；聯合國學術機構也贊助了多個國家針對預防男性受暴的研究，如南亞與東南亞等國。在此背景下，有更多跨國的學術著作出現，其研究主題涵蓋陽剛氣質與運動、災難下的陽剛氣質、原住民的陽剛氣質等。

在全球的學術風潮下，陽剛氣質研究中最為穩定的研究項目是由智利的José Olavarría、Teresa Valdés 與其同儕主導的國際研討會、書籍與研究計畫。此研究項目至今於20多年間持續產出，並在最近發布了週年紀念刊物《拉丁美洲的陽剛氣質：性別平等研究與政策》。

因應學術研究的蓬勃，實作層面的活動也持續發展。於學術領域形成初期，其與解放運動之間在改變陽剛氣質與抵抗壓迫的目標上，有著緊密的連結。儘管結合學術與行動是個艱困的任務，許多試圖處理性別暴力議題的行動仍然以此目標為基礎，如火如荼地展開。陽剛氣質研究迅速地在專業領域受到應用，如教育、諮商與心理治療、男性健康(包括飲食、事故預防、抽菸、飲酒、勞動環境壓力、性病)等。

## > 陽剛氣質概念的變遷

任何研究領域都不可能是一成不變的，畢竟研究的目標就是要延伸、修正人們的知識。過去四十年間，陽剛氣質研究中也出現許多辯論、轉變，甚至是劇烈的衝擊。

關於「霸權陽剛氣質」此一社會學概念的論辯，即是其中之一。這個概念最初是在1980年代的一篇結構分析中出現，其試圖將陽剛氣質中的階級因素，與男女不平等的議題相連結；自此，霸權陽剛氣質就經常在缺乏社會結構的分析下被使用。此概念

>>

雖然有過度簡化的問題，不過仍然為陽剛氣質研究提供很好的分析工具，在檢視性別關係的權力與不平等上有諸多貢獻，尤其是在陽剛菁英、教育機構、勞動環境、大眾媒體等研究領域。

然而，我們也可能因此過於將結構決定的觀點視為理所當然。因應此一困境，人們開始為陽剛氣質的定義與實踐納入彈性，揉合出更為靈活的視野。後結構主義的取徑即在此種關懷中，嘗試以敘事的角度來理解性別。其中尤為有趣的說法，是霸權的陽剛氣質形式，也可能會因為吸納非主流形式的陽剛氣質而產生變動——「混種陽剛氣質」(hybrid masculinities)的概念便於此背景下出現，其使我們得以更深入地理解性別秩序的變遷。

關於概念的討論，也延伸出了一個重要的問題——我們如何創造出一套更為對等的陽剛氣質理論，使男性得以在性別平等社會中生存？這類研究很早就於各個領域中逐漸開展，許多研究者試圖探討陽剛氣質如何在各種社會情境中被重新想像——例如在環境運動中、在丈夫分擔家務勞動的「公平家庭」中、在轉職為家庭主夫的工人身上、在年輕男性練習成為參與程度更高的父親時、在由軍人轉變成的和平主義運動人士身上。是否應該將這些轉變視為一個新的、「單一的」陽剛氣質形式，仍然有待商榷。我們姑且可以這樣理解：重要的是，相關學術研究不僅呈現出那些正向的故事，也帶領我們看見故事中關於暴力與壓迫的面向。

### > 複雜化世界圖像

如同其他社會學領域，陽剛氣質研究也受到交織性概念的影響。早在許久之前，陽剛氣質的著作即注意到了文化的差異，特別是在與階級有關的現象中。Paul Willis 於1977年針對英國工人階級的研究《學做工》就是一個經典的案例。近幾十年來，族群、種族與原民性等層面更加受到研究者關注。

「交織性」指涉跨越多個向度的社會階層制度，並藉著幾何學的隱喻，為差異的面貌提供較為完善的描述。Mara Viveros Vigoya 於2018年以其在哥倫比亞的研究為材料，出版了《Les couleurs de la masculinité》一書，書中即藉由對交織性於歷史動態過程中的分析，來解釋現實中發生的權力、壓迫與社會抗爭。

對這個研究領域的未來發展而言，重要的是持續地將更多後殖民、去殖民、原住民與全球南方的觀點涵納進來。過去曾有將近十年間，不管是印度的 Ashis Nandy 還是紐西蘭的 Jock Phillips，其針對殖民主義下陽剛氣質的研究幾乎是獨立進行的。如今，此領域已經有豐富的產出，包含各種關於陽剛氣質的調查、民族誌研究、制度研究，以及針對後殖民／半邊緣國家中陽剛氣質的理論研究。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來自拉丁美洲的學術著作，對於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後殖民世界下的依賴性如何形塑陽剛氣質，提出許多全面的觀察。

### > 知識的政治性

我將這篇文章的標題取做「玩火自焚」(playing with fire)，是因為陽剛氣質研究很可能會與某些強大利益產生衝突。社會研究與理論經常對擁護社會階層的保守價值造成威脅，而這並不是一件小事。當我們細數世界上最具權力的團體——億萬富翁、跨國企業管理者、軍隊將領、政治精英、宗教權威——這些皆是極度陽剛化的團體。反動是意料之中的事，且正在發生。

有關陽剛氣質的暢銷書，並不是研究文獻，而是以大眾心理學中對於所謂「真正的陽剛氣質」的推廣與崇尚為主要論述。早在1980年代，我針對陽剛氣質的經驗研究，收到的第一筆經費，就在國會中遭到保守主義政治家的抨擊。近年來，性別研究領域更在匈牙利的大學中受到封殺，同時也有其他政府正取消對於人文社會科學的補助；極保守派的天主教教會更對「性別理論」發起攻擊，這樣的立場也在國際上的右翼勢力與運動中逐漸蔓延。

因此，對於研究者而言，這並不是一個和平的研究領域！此現象同時也告訴我們，對社會科學或是社會正義抗爭來說，陽剛氣質皆是關鍵的議題。其不只是性別與性研究的必要元素，也對家庭研究、工業社會學等領域有重大影響。陽剛氣質的相關知識使我們得以認知到社會變遷面臨的壓力與抵抗如何存在。更重要的是，陽剛氣質研究使我們能夠採用一種全新的視角去理解權力、分析權力如何鑲嵌於日常生活中。讓這樣的研究能夠存續下去，是至關重要的目標。■

來信寄至：

Raewyn Connell <[raewyn.connell@sydney.edu.au](mailto:raewyn.connell@sydney.edu.au)>

# > 悼念 Mona Abaza (1959-2021)

Michael Burawo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柏克萊分校, 美國



攝於開羅美國大學, Mona Abaza 身在自己的書桌前。



Mona Abaza, 於其著作《記憶中的棉花莊園》的相片展覽。

2021年7月5日這天,一位偉大的社會學家與世長辭。與癌症搏鬥兩年之後, Mona Abaza 最終仍不敵病魔侵蝕。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她都盡力地活著;臨終之前,她仍時刻關注政治局勢與疫情的發展,並關心朋友們的生活。即便躺在柏林的病床上、承受著龐大的病痛,甚至失去部份器官的功能,她依然堅持為開羅美國大學的學生們講課。在絢爛的職涯中,其產出的學術作品涵蓋了不同主題,例如埃及鄉村女性、伊斯蘭與西方世界的關係、都市消費文化、埃及繪畫、阿拉伯之春等等。

在其最終的兩本著作,她將自身的社會學思想如藝術品一般完美呈現。《The Cotton Plantation Remembered》(2013)一書中,她透過橫跨數十年的田野資料,將家族莊園的歷史藉由會計、店員、工人、園丁等人的視角精巧地描繪出來。其最後的作品《Cairo Collages》(2020),則以抒情筆觸將2011年埃及革命之後的生活記錄下來。這是一部民族誌的天才之作,整本書的敘事以她在開羅市的住處——一棟位於市中心的建築——周遭的事物為軸,圍繞著重複故障、修復的電梯,生動地隱喻了整座城市的

狀態,巧妙地結合了烏托邦與反烏托邦的主題。

除了流利的英語之外, Mona 同樣熟悉法文、德文與阿拉伯文;她總是能夠友善、同理地面對他人的困境,其作品更跨越東西、南北、在地與世界等範疇,將各具差異的處境與觀點匯聚並創造連結。她同時與本刊有深厚交情,曾針對阿拉伯之春的崛起與衰落發表一系列含攝影的作品:「[解放廣場的革命時刻](#)」、「[高牆之戰](#)」、「[埃及反革命暴力](#)」,以及一場訪談「[後革命時代的埃及命運](#)」。以下收錄幾份朋友與同仁對 Mona Abaza 的悼念。■

Vineeta Sinha,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新加坡

**對**我來說, Mona Abaza 的逝世是一份難以用言語表達的損失。我們是在她某次來新加坡做南亞研究的時候認識的。她是一位傑出的社會學家、社會運動者、女性主義學者,也

是一位為同儕與後輩帶來許多啟發的導師,她的離開在我們心中留下了無以名狀的缺口。毫無疑問地,她對於學術的堅持、智慧與熱忱是頗具開創性的。她取得國際間備受尊崇的地位時,正好是全球學界在處

理性別、種族、宗教偏見議題上陷入困境的時期。Mona 有著不屈不撓的精神,即便在自身面對困難時,也表現出無窮的活力與友善。我最欽佩的是她能以深具包容的視角,敏感地察覺歷史中的歧視與其遺留

>>

下的偏見。她有著堅定的信念與勇氣，能在看見暴力時指認其存在並挺身而出。近年來，我與 Mona 在各地的ISA會議上互動，並有機會見證她將這樣的關懷展現出來，特別是在面對全球南方的年輕、女性

學者的時候。她時刻鼓舞著人心，更是女性主義學者的典範，致力於重新建構性、性別與權力的動態關係——這些事物持續地在我們身處的社會世界中留下深刻的印記。我將永遠懷念 Mona 發亮的雙眼、富有感

染力的微笑，還有她總是樂於和朋友們一同逃離沉悶的會議、偷喝杯咖啡的愉快經驗。安息吧，Mona，我們會一直記得你。■

Bryan Turner, Australian Catholic University, 澳洲

**M**ona 是一位極為傑出、富含魅力的學者，且有著非常複雜、廣泛的知識興趣。她驟然地離開人世，對於朋友、學生、開羅美國大學和整個學術界來說，都是沉重的打擊。我的生活很幸運地與 Mona 有許多交疊，包括在澳洲阿德萊德、德國比勒菲爾德、荷蘭、英國劍橋、開羅和新加坡等等。她經常在

英國文化研究領域的權威刊物——《理論、文化與社會》上發表作品，但她的研究不僅於此，更囊括了如2013年棉花種植園的歷史等主題。Mona 於1990年獲得比勒費爾德大學的博士學位，並熟悉多種語言，她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世界主義者，其在學術工作與生活中結合了東方與西方。不同於許多只關注中東區域的伊斯蘭研究

者，Mona 在一開始的研究中，就同時將埃及、馬來西亞與印尼之間的連結納入討論。她在2002年出版的第一本重要作品《馬來西亞與埃及：伊斯蘭教與知識的辯論》中，即為「知識的伊斯蘭化」(Islamization of Knowledge)此一概念提供開創性的分析。至今，這個研究概念的重要性仍持續地增加。■

Suad Joseph,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戴維斯分校, 美國

**第**一次遇見 Mona Abaza，是超過二十年前的事，那時我在加州大學擔任開羅美國大學海外教育計畫的主任，和她有兩年的時間在同一個單位。當時她非常地傑出、受歡迎，經常有演講、課程之類的各種邀請，幾乎隨時都在外奔波，就像是從單位中消失了一樣。直到終於有機會在共同朋友家的餐聚中見面，面對面地閒聊、相處之中，她的才華、社會學的洞察力，還有對埃及與阿拉伯地區懷抱的熱忱令人震驚。這種傾盡全力的關懷，在2011年於埃及發生的抗爭中，更是耀眼地展現；她與數百萬人一同參與在現代埃及與阿拉伯世界最具希望的時刻中，致力於政治與

學術活動並脫穎而出。抗爭者們精心設計出了一套充滿巧思的交流語言，Mona 則將遍佈在解放廣場周遍建築的塗鴉創作作為研究對象——就像是吹響的號角一般，其召集人們說出自身的訴求。她每天走在廣場附近，將塗鴉作為人民起義的聲音拍攝下來，捕捉了數百萬埃及人共同的想像、希望與靈魂、紀錄了深具歷史意義的時刻。當我到現場時，她帶著我參觀廣場與周圍的街道，同時敘述著那些為了能夠被聽見而抗爭、發聲的創意與思想。她將這一切事物保存下來，將藝術創作轉變為歷史。我深受她的敘述、對革命與抗爭的理解，以及她賦予埃及人日常生活能動性的動力所感動。

多年之後，我和共同編輯 Zeina Zaatari 邀請她為我們的新書《Handbook of Middle East Women》(Routledge 出版)撰稿。當時她已經深受疾病所苦，不過仍然答應了下來。在我們將本書送審後不到幾週，Mona 便過世了。雖然她已經離開人世，不過我們在書中留下了她精彩的文字。她的女兒 Laura Stauth 同意協助我們進行後續版本的修訂。即便 Mona 再次地消失了，不過她並未離開我們——她將以文字的形式，永遠長伴我們身邊。■

Paul Amar,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聖塔芭芭拉分校, 美國

**針** 對傳統上西方為中心的社會學, Mona Abaza 提出了一套適用於全球的理論模型, 使得過往鄉村/都市、經濟/信念、物質/美學等概念之間難以接合的落差, 得以被連結起來。可以說, Mona 在社會學界掀起一場革命—以埃及為基礎的分析, 為二十一世紀的社會學提供未來能夠努力的方向。她出

版的學術著作數量難以想像, 且每份作品都為社會學領域帶來極大的貢獻。例如: 她針對消費文化的都市社會學分析, 即結合經濟人類學視角將空間的商品化與複雜性展現出來; 她針對馬來西亞、歐洲、中等地區伊斯蘭日常的農村社會學研究, 則為性別與階級面向注入了新的觀點; 她的藝術社會學研究, 更藉由在地的「街道」視

角, 為記憶、哀悼與紀念的分析開創深具反身性的方法—這三部分的研究成果以相當動態、具啟發性的方式互相交織、對話, 為學術領域帶來重大貢獻。Mona 不只是一位傑出學者, 也是友善的導師。她的課程具傳奇色彩, 不僅為外國學者來訪提供可能性, 也為開羅美國大學的建立打下地基, 使其在學界領有一席之地。■

Syed Farid Alatas,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新加坡

**M**ona 是一位傑出的學者、一位總是願意關心、付出的朋友, 是一個很棒的人。她的逝去讓我重新回想起我們之間珍貴、緊密且溫暖的友情—若沒有這些特質, 再重大的學術成就也許都顯得毫無意義。

於我而言, Mona 涉及多個領域的學術生涯, 並不是用優秀、深具洞見等詞彙就能形

容的—她的學術生涯以極為個人的方式觸動了我。在早期的研究中, Mona 批判性地分析埃及與馬來西亞的知識生產。當時像她一樣有如此獨特的研究關懷, 關注阿拉伯世界(她自身的宗教性信仰)與馬來—印尼群島的學者並不多。南方研究以及其形塑的互動關係, 在如今社會學界掀起一波討論, 不過Mona早在三十年前就已經注意到了這個主題。

關於Mona, 我最鮮明的記憶是2020年的一次電話通訊, 她當時已經在柏林接受治療。雖已生了重病, 她仍保有關心他人的意識, 在電話中和我詢問當時另一位朋友的消息, 那位朋友當時也生了重病。Mona是位嚴謹、充滿影響力的社會學家, 也是一位親切的導師, 不過在我的記憶中, 她更是一個討喜且熱情的朋友。再見了 Mona, 願你來世的旅程一路安穩。■

Sami Zubaida, London 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 英國

**我** 認識 Mona 好幾十年了, 從她還是學生, 到她在德國、荷蘭、瑞典等地進行不同研究的時候, 我們都曾經相遇。不管是在萊頓喝酒, 還是在隆德觀光, 和她相處與談話之間, 總是充滿了愉快和幽默的氣氛。多年來, 我總是抱持著極大的興趣和愉悅關注著她的各種研究, 尤其是她對於埃及的生動描

述—她既能在文字中保有分析性, 又能從個人於城市生活的獨特視角, 將商場、住宅區、在城市中通勤與移動的困難等主題, 以細緻又狡黠的幽默感呈現出來, 是極為深刻的都市民族誌。最引人注目的, 是她對解放廣場事件與後續發展的深入描繪、紀錄, 以及她對塗鴉的革命性研究。其學術作品涉及的主題並不僅止於都市, 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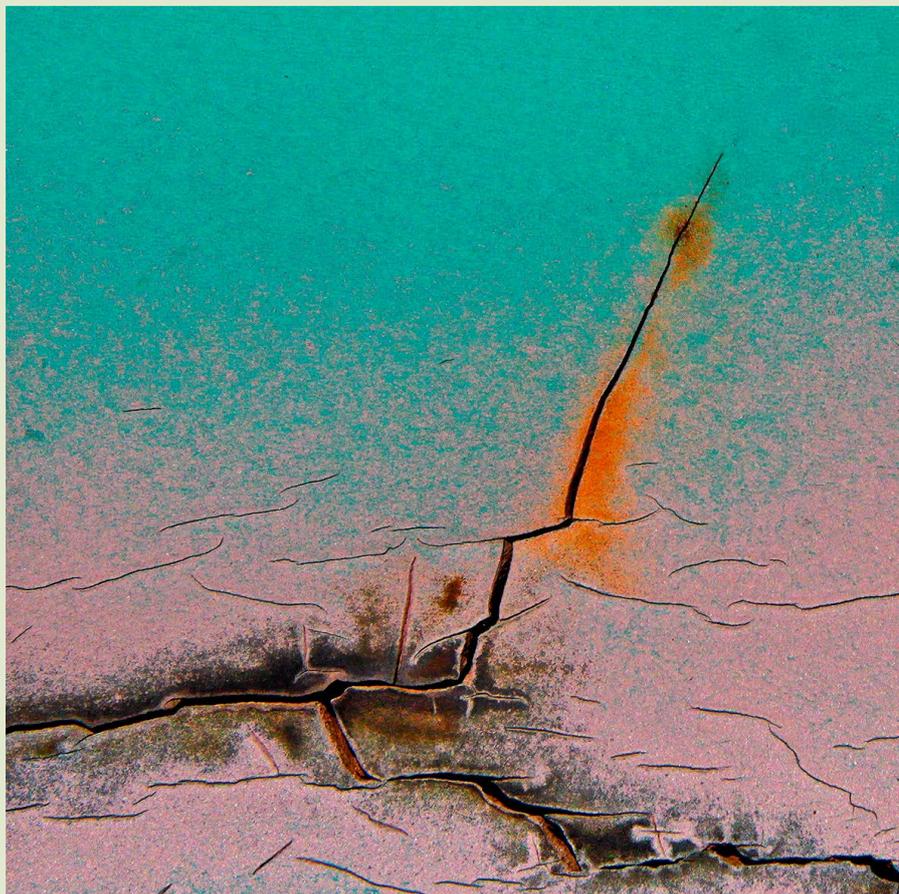
在《The Cotton Plantation Remembered》這本以莊園與鄉村為主題的著作中, 也將農村生活的轉變記錄了下來, 是自傳與歷史研究的典範。在Mona 的各式民族誌中, 同樣值得注意的是她的攝影作品, 更展現了Mona 的觀察力與藝術細胞。Mona 離開地太早, 對我們以及整個學術界來說, 都是莫大的損失。■

Mona Abaza 發表的重大學術著作:

- 《Debates on Islam and Knowledge in Malaysia and Egypt, Shifting Worlds》。Routledge Curzon Press 出版, 英國, 2002。
- 《Changing Consumer Cultures of Modern Egypt: Cairo's Urban Reshaping》。Brill-Leiden 與 AUC Press 共同出版, 2006。
- 《Twentieth-Century Egyptian Art: The Private Collection of Sherwet Shafei》。The American University in Cairo Press 出版, 2011。
- 《The Cotton Plantation Remembered: An Egyptian Family Story》。The American University in Cairo Press 出版, 2013。
- 《Cairo collages. Everyday life practices after the event》。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出版, 2020。

# > 引言：印度社會學的新方向

Sujata Patel, Umea University, 瑞典, ISA 社會學史 (RC08)、城市和區域發展 (RC21)、概念和術語社會學 (RC35)、歷史社會學 (RC56) 研究委員會成員, 以及 RC08 董事會成員



為了理解當前的政治和社會發展進程, 需要新的理論方法和方向, 其近年來在印度社會學中已經越來越成熟了。  
來源: Evelyn Berg / flickr。

印 度的社會學知識體系與殖民主義和國族主義的政治計劃密切相關。然而, 自1980年代和1990年代以來, 殖民主義和國族主義促使個人和群體採用一種新的權利語言, 並質疑印度的被動公民概念。這樣的結果有兩個層面的影響, 一方面, 喀什米爾和印度東北部的婦女、部族、低種姓、族群、自決和次民族主義的區域的運動以及叛亂都呈現增長, 另一層面上, 興都多數主義更加鞏固。

這些發展對社會學思想產生了影響, 因為它鬆動了民族誌對社會學既有的規範。新一代學者已經超越了印度本土社會學與西方社會學兩者的爭論, 重新構框研究問題、觀點和研究方法。他們試圖探問: 什麼是社會學? 它是否可以繼續使用殖民和國族主義方法(例如民族誌)來理

解印度的「社會」? 如果沒有, 可以使用哪些新方法? 這些方法能否促進比較觀點的研究? 最後, 社會學與那些不僅在印度, 且在全世界被剝削、歧視和排斥的人有什麼關係?

在本刊的印度社會學特輯中收錄的四篇文章, 構協助我們重新思考、理解印度新社會的構成。這些文章詰問印度推動的現代性進程, 並探討由此產生的分裂和衝突——這些分裂和衝突導致針對底層群體的公開/隱蔽的暴力行為, 並影響了群體間的信任關係。文章中, 作者們也討論自身在將民族誌作為理論和方法應用時, 所面臨的限制和約束。他們提出疑問, 並試圖發展新的概念和針對理論和方法的反思, 以幫助回答他們的研究問題, 從而理解印度正在發生的複雜變化。

>>

Rakesh Krishnan 認為，二元對立的原則，形塑了部落群體（生活在印度中心地帶的社會群體）的殖民政策和獨立後政策。一方面，殖民地和後來的民族國家根據稱為「預定保留的行政區」來確立群體分類，以保護他們的文化免受主流「文明」和「遷佔」的農民影響。另一方面，對線性發展的信念導致這些政權引入發展計劃，將這些群體納入文明和現代舞台。這種二元對立的概念導致衝突和矛盾的增長，以及部落對主權權利的主張。為了解決這個對立，Krishnan建議使用邊境的概念。他認為，對印度中部的研究混亂無章，只有歷史學的方法才能幫助社會學家分析國家與人民之間的衝突和對話，並解開這些衝突、矛盾和混亂。

與主張二元對立的殖民和國族主義政策的部落民族誌家／人類學家不同，從事性別研究的社會學家自 1970 年代後期以來，便放棄了民族誌式理解歷史的方法。Sneha Gole 認為，這種方法使印度的女性主義研究能夠以激進的方式，質疑和破壞殖民主義、國族主義框架之下，以及早期印度女性運動對女性的觀點。1990年代引入的交織性討論進一步推動了這種思考。Gole 討論了她如何使用生活敘事方法，以及記憶研究的見解，以了解三代女性主義者如何通過交織的視角重新評估他們的生活，重新解釋他們早期的激進干預措施。她認為，他們闡明了階級、種姓、性取向、身障和地區相互交織的方式，並構成了她們的女性主義身份。她認為，這些生活敘事為如何理解印度語境中的交織性提供了一個概念工具。

接下來的兩篇文章，討論如何在新的環境和視角下使用民族誌方法。印度東北地區長久以來皆有叛亂活動的發生。在此地區，其人口（再次）被英國界定為「部落人民」。這些叛亂活動在印度獨立後繼續存在，新的國家實施的戒嚴法，即武裝部隊特別權力法（Armed Forces Special Powers Act），賦予軍隊管理該地區的權力，使生活在該地區的人民成為臣民，而非公民。Soibam Haripriya 於是提問：這樣的脈絡，

在我們將社會學作為民族誌實踐時，將如何造成影響？軍方和叛亂分子之間日益增加的衝突，導致彼此缺乏信任、難以區辨誰是自己人、誰又不是。除此之外，基於懷疑的無差別屠殺，使得社會學領域充斥著謠言，助長了彼此的不信任。Soibam 認為，這種令人擔憂的政治脈絡對本地／同行的社會學家、同一種族／部落群體的成員來說也是一個重大挑戰。Soibam 進一步探問——在這種情境之下，那些想要分析「暴力如何影響社會關係？」的社會學家，該如何進行研究？Soibam 反思在暴力場所進行田野工作的方法，並主張文本的探索比起民族誌的田野更能幫助圖像式的理解脈絡。

本節的最後一篇論文由 Shireen Mirza 撰寫，他認為民族誌有助於理解種姓意識形態與現代性的交織。她的民族誌工作側重於現代印度的城市衛生系統作為種姓污染的治理。她的研究是關於孟買市的衛生系統，該市政府招募了種姓等級最低的「不潔」種姓來挑選和清理廢物：清潔、清掃、屠宰和清除垃圾。她建議，污名和種姓勞動的概念有助於理解當前從事上述勞動活動的人為何象徵不潔。她以達利特穆斯林和達利特印度教拾荒者為例，展示了種姓和宗教的身份交織。她以這部民族誌著作質疑將印度教種姓與其他少數弱勢群體分開的殖民劃分。Mirza 使得既有概念鬆動，描寫孟買市立固體廢物管理部門種姓和汙名的身體史。她的民族誌揭示了被污名化的身體是如何作為種姓的載體，並根據特定對象形構出不同的身體。

這些文章各自強調了需要被探討的差異，以在社會學思考中建立良好的實踐。他們不僅主張一種可以反思性地探討知識生產的政治及知識流通，而且還肯任以科學探討和理解當代和人性的相關性。■

來信寄至：

Sujata Patel <[patel.sujata09@gmail.com](mailto:patel.sujata09@gmail.com)>

# > 解構印度中部的部落地理

Rakesh M. Krishnan · University of Hyderabad, 印度

在這篇文章中，我主張加強對部落社群的社會學理解是歷史社會學非常重要的一環。目前，關於部落社群的人類學文獻所提供社會學分析較缺乏脈絡化和歷史向度。因此，針對分析的範疇進行歷史再脈絡化的比較研究有助於澄清部落世界的混亂糾葛。我認為，「邊境」(frontier)作為一個範疇可以捕捉到這些混亂的糾葛、國家權力的局限和人民的想望。在這裡，邊境一詞指涉了安居處的邊緣(edge of settlements)，在這個邊緣具有未知事物的存在，也意指那些針對特定主體、及其活動的未知。邊境作為一個概念將批判性地深入探究社會秩序與社會工程的不同文化之間的交織。

## > 複數的殖民地理

差異和層級制度的概念決定了關於部落社群的殖民政策——特別是那些生活在印度中部丘陵地帶的社會群體，該地區有河流、茂密的森林和豐富的礦產資源。殖民擴張使「部落」一詞標準化，殖民統治者從非洲的用法中借用了「部落」概念。鑑於被統治者的萬物有靈論的宗教信仰，殖民統治者將這些群體界定為原始、野性和野蠻，並將他們與印度教、有種姓概念的農民社群區別開來。由於這些難以管理野地——即19世紀初起義和叛亂的地點，使得殖民當局通過了1874年的《Scheduled Districts Act》，劃分了不同的地理區域，將部落社群安置和控制到文明社會之外。在這些行政／地理飛地內，為了將部落納入主流社群，殖民地的行政人員和傳教士開始了一項「文明使命」。部落社群在殖民統治計劃中的從屬地位打破了前殖民時期認為部落社群的人與土地是在國家直接控制之外的理解。

殖民法律侵占部落的自然資源和土地，造成與部落地區的緊張關係。部落社群是第一個抵抗英國殖民主義的社會群體，因為掠奪性資本主義、土地侵占、定居化和稅收制度擾亂了他們的生活方式。殖民行政官員和人類學家通過民族學調查、文獻和報告，幫助建立差異和層級制度的項目。獨立後的國家政策和人類學研究繼續將他們稱為荒野之人，需要被限制在文明、文化之外的地區。

## > 部落社群和建國計畫

在殖民晚期和後獨立階段的初期，人類學家針對部落社群在建國計畫中的位置進行論辯，採取的研究取徑包含將部落視為「高貴的野蠻人」、以及關注其與印度教社會的同化。儘管這些視角制定了不同的策略，仍然延續而非取代殖民者在概念化部落時對差異和層級制度的理解。在研究部落的人類學家的幫助下，國家不加批判地接受了殖民者的分類，將部落社群視為不斷需要國家幫助的無文字社群(pre-literate groups)。即便是包括人類學在內的國族主義社會科學，也未曾關注這些區域當中，因群體生產力和民心所向而促成的歷史變遷背景，或是去檢視後殖民社會中的歷史性，以及殖民差異與層級制度的關聯。因此，部落社群繼續被視為從屬群體，處於進化週期中的第一階段、停滯、且抗拒變化。

有兩種策略決定了接下來針對部落社群的國家政策——保護和區辨部落社群，使其有別於傳統印度教農民社群，並發展部落地區的資本主義建設。國家和社會科學以部落子計劃區域和綜合發展機構的形式在其屬地上追求部落社群的發展，透過教育、醫療和其他基礎設施帶來現代化的發展，即便是在指定用途區域的部落社群也享有法律特權和社會文化權利的保護。

>>

# 「在研究部落的人類學家幫助下，國家不加批判地接受了殖民主義之下的分類，將部落社群視為需要民族國家救助的無文字群體。」

國族主義政府發起的發展並沒有扭轉資本和非部落地區對部落地區的侵占。此外，國家公園的建立使部落社群與國家疏遠。越來越多的自然資源開採計劃（如採礦和水壩）破壞了部落景觀，引發了部落自治運動。從1970年代開始，共產主義革命者和不抱有任何期待的部落社群開始關注這種透過剝奪進行積累的過程。

並非每個部落地區都成為預定保留區，也並非所有部落民族都保持孤立狀態。一些高山地區沒有得到任何保護，他們的土地變成都市化和觀光的空間。其他居住在高山和森林的社群因種植計畫和柚木種植而失去了土地。行政飛地之外的部落社群成為僱傭勞動者，而飛地內的人在資本循環之外仍處於孤立狀態。印度的人類學家／社會學家並未針對因殖民和後殖民資本所帶來的混亂局面做出適當的分析。

## > 邊境：取代政府的分類範疇

部落社群的社會學在很大程度上借鑒了殖民的框架，並且不加批判地接受了國家制定的治理術（將部落社群納入治理，但同時排除他們某些權力），這是一個通過特定的行政機制將他們排除在一般人之外，並通過教育和其他同化策略將他們整合的過程，延續了差異和層級制度。部落社群的社會學在很大程度上僅限於評估以問題解決導向為主的政府政策與計劃。在這種情況

下，國族主義社會學家缺乏歷史和比較的敏感性來理解有關部落社群的問題，可視為印度社會學想像霸權的部分遺產。部落族群在殖民主義和國族主義框架中的從屬地位掩蓋一些重要的過程，例如，部落文化地理成為行政區的崩解過程、以及部落交錯在這些行政飛地內外的不同歷史軌跡。由於缺乏對於認識論範疇的分析，使我們極需一個詮釋機制以比較的觀點重新加入歷史、地理的面向，來取代既有鑲嵌在「部落」這個概念中的權力框架。

因此，邊境作為概念有助於反思人類學的限制，在殖民和後殖民國家構成的地理中進一步脈絡化部落的分類系統。邊境作為一個範疇，可以掌握部落生活世界的流動與變遷，以及國家與人民之間複雜的辯證性互動。此外，邊境作為已知和未知之間的分界線，提醒國族主義社會學應研究殖民主義和後殖民民族國家所建立的差異和層級制度。因此，我認為，邊境概念揭示了地理學背後的意識形態，這些意識形態形塑了從屬的社會群體中根深蒂固的主體性，從而幫助我們反思社會科學。■

來信寄至：

Rakesh M. Krishnan

<[rakeshmkrishnan@gmail.com](mailto:rakeshmkrishnan@gmail.com)>

# > 女性主義交織性： 新取徑

Sneha Gole, Savitribai Phule Pune University, 印度



2014年，在馬哈拉施特拉邦的Gadhinglaj-Kolhapur，為抗議對女性的暴力行為，而發起的活動。  
來源：Sanjeev Bonde / [Wikimedia Commons](#)。

**本**文討論女性主義領域以及其中「女性」範疇的重構。透過分析來自馬哈拉施特拉邦的女性主義者（女性運動的參與者）的生命敘事，我將檢視交織性理論及其在印度特殊的概念軌跡（相對於美國的性別-種族背景）如何在方法論上將敘事和記憶研究結合在一起，提供重新思考交織性的當代詮釋的新方法。我選擇以社會運動者的聲音為主，因為他們最投入、理解和貫徹女性政治。我採訪的運動者是橫跨三個世代、屬於同一語言社群者。透過這些訪談可以看到，在交織性理論重新思考女性範疇的架構下，他們重構了記憶的框架。

## > 單一的「女性」範疇

霸權殖民主義和國族主義的框架以特定方式想像「女性」這個範疇。在殖民框架中，「本土女性」的地位成為文明或缺乏文明的代名詞，或是

在殖民者和精英本土男性之間的國族主義對抗中，成為何謂具有本真性的印度傳統的辯論對象。這導致將女性再現為國家的看法——亦即從印度母親（公眾）到私領域等多元價值的呈現。上層種姓的中產階級女性成為「印度」女性的代理人。霸權國族主義框架繼續將女性視為「文化的象徵」，但後殖民國家也將女性視為社會的「弱勢群體」，將她們同時置於現代性和傳統之中。女性要不被制度化的家庭計劃政策視為生物再生產者，要不就是在 mahila mandals（以國族主義模式組織的婦女協會）的介入下被視為不工作的妻子。下層種姓的工人階級婦女和以語言差異作為社群區分的團體，兩者在後殖民主義的表述中仍是無形和邊緣化的。

在 1970 年代，女性運動的新階段主張將經驗作為建立知識的場所，以重新思考這些既定的範疇，並突顯結構性歧視（通過左翼意識形態理

解)和婦女暴力的問題。這一階段的運動挑戰了「傳統」、私人／公共的區分、以及女性做為國家象徵的形象。它側重於農村和工人階級婦女，強調她們作為受剝削勞動者和生產者的角色。這挑戰了主流的國族主義和殖民框架，著重在使女性成為可見的發展／現代性的主體，但也掩蓋女性之間的不平等。

### > 往交織性邁進

1990年代標誌著兩個轉折，一是國族主義論述透過治理論述來看待女性，二是女性運動由強調女性轉向性別(women to gender)。這也是交織性在兩個層面上被具體操作的脈絡：作為分析的概念工具、以及作為代表各種受壓迫群體的非政黨婦女團體所採用的組織策略，例如：達利特人(這個詞的字面意思是「破碎的」，但已被過去被稱為賤民的種姓重新拿回來作為身分認同的標誌)、女同性戀者、穆斯林(陷入困境的少數宗教群體)和 OBC(其他低下階級、社會和經濟弱勢的低種姓)。每一個群體都有其獨特的交織性經驗，並同時質問著各自在印度女性主義政治主流討論中缺席的原因。儘管它借鑑了非裔美國人概念化種族—性別的方式，但印度的交織性有著複雜的軌跡，因為光是性別的交織性就涉及多個軸線—階級、種姓、部落、性、殘疾、語言社群和宗教信仰。達利特女性主義理論以達利特女性的不同經歷和苦難為中心，強調女性做為女性主義主體的缺席，這樣的困境特別反映在家庭—婚姻—親屬制度中。然而，種姓作為不平等的分級制度比種族／階級或在上層種姓／達利特的二元分法還要複雜，因此需要更多的探索。在這種情況下，我認為女性主義政治這個領域已經轉變為根據交織性理論來重新評估「女性」這一範疇，正如不同時間點那些女性主義運動者生命敘事的轉變那樣。因此，我的研究指出交織性理論提供了重要的理論資源，來理解「女性」概念如何透過等級不平等進行重構。

### > 敘事和記憶的工作

如果說1970年代的女性主義運動成員忽略了因種姓而產生的差異，並強調共享單一、普遍的女性經驗，那麼今天的情況將有所不同。在今日，政治脈絡和重新構框女性問題的方式已經影

響了這些運動者重新概念化和理解種姓和家庭 - 婚姻 - 親屬 - 性制度的關係，並反思這些制度如何塑造他們的經歷。

在1970年代和1990年代投入政治的女性主義運動者，通過新的視角回憶他們的童年和成長歲月，進而理解他們生為特定種姓的婦女，這種位置如何塑造他們的生活環境和機會。即便他們原先的意識形態認為種姓應該被視為一個前現代的範疇，並認知到種姓在現代涉入認同政治，並在造成印度女性主義政治的分裂，這些運動者現在也願意開始正視種姓-階級-性別-性的交織性構成。自我的故事透過家庭、婚姻和親屬為中介的種姓-階級社會化來重新書寫。使用生命敘事(life narratives)的方法不僅有助於重新詮釋社會地位和特權交織的現實記憶，還有助於在印度社會的脈絡下進一步理論化交織性的概念。在這個過程中，有機會構建印度版本的新女性主義交織性理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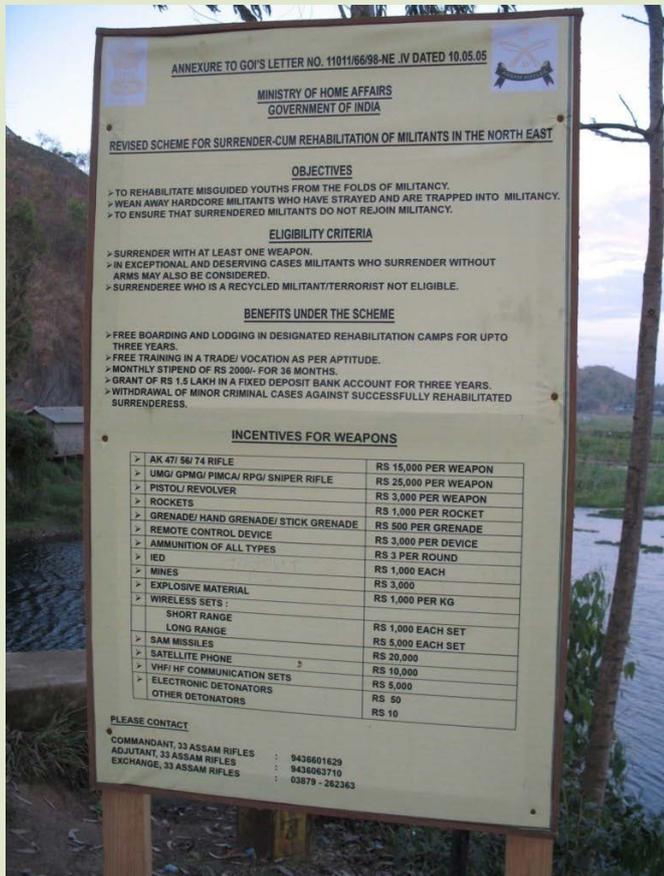
生命敘事方法與記憶研究一起幫助我們了解女性主義領域的當代觀點如何重建新的女性主義運動者的自我：他們為自身和女性主義研究開啟了印度各個階級制度中的特權／從屬的提問。當這些方法被用來挑戰霸權框架(殖民、國族或早期女性主義)中概念化的「女性」論述時，不僅指出了女性主義反身性的重要性，也有助於提出如何理解當代的交織性的理論視角。此外，這種方法論使我們能夠打開和脈絡化個人記憶，以了解集體政治的變遷，並勾勒出可能的途徑。交織性理論可以被視為當代印度社會中種姓群體／宗教社群／語言社群不同等級的複雜定位。當然，鑑於這些訪談是在單一語言社群內進行的，我們的假設目前仍僅限於對單一地區的交織性進行討論。即便如此，這也有助我們針對印度其他語言社群中的層級制度間的差異和連結開啟更多論辯。因此，這個計畫並非要提供理解其他地區和政治脈絡的模板，而是一種處理這些問題的方法。這個故事取材於一個特定的區域，對我們理解印度當代女性的建構有很多啟示。■

來信寄至：

Sneha Gole <[gole.sneha@gmail.com](mailto:gole.sneha@gmail.com)>

# > 動盪的田野： 暴力場域的社會學實作

Soibam Haripriya, 獨立研究學者, 印度



2011年4月，曼尼普爾邦 Bishnupur 區 Karang 附近的一塊招牌。  
來源：Soibam Haripriya。

本文將探討我們如何用社會學的角度看待國家內的危險暴力。在印度，人民對民族國家政策的抵制是一個尚未被解決的問題。印度的東北地區由阿魯納恰爾邦、阿薩姆邦、曼尼普爾邦、梅加拉亞邦、密索藍邦、那加蘭邦、錫金邦和特里普拉邦組成，連接著緬甸、不丹、孟加拉、中國和尼泊爾。政府的民族政策對這些地區帶來負面的影響，且在這股民族自決的風潮中，這些地區頻繁出現武力衝突；因此，1958年《武裝部隊特別權利法》立法後便持續在印度東北地區（除了錫金邦）實行；同年，阿薩姆邦的納加丘陵地區的行政機構也遭到此法的干涉。《武裝部隊特別權利法》給予軍隊能夠在街上殺害嫌疑犯的特殊權力，使生命權受到迫

害。不出所料，民族霸權的概念並沒有成功深入這些因《武裝部隊特別權利法》而培養出有罪不罰文化、謠言遍傳、互相猜疑的社會。

在曼尼普爾邦，叛亂組織從《武裝部隊特別權利法》立法初期的4個增加至超過32個（不包含派系分支）。許多研究證實，長期使用軍事力量解決政治問題使武力排除變得更不可能，且現況影響的生命層面廣，使追究這些死亡是否為國家造成已經顯得無意義。由聯合國與社會人權聯盟（Civil Society Coalition on Human Rights）所提供的聯合權益報告（2016），揭露出印度派遣了五萬名軍人駐紮在人口僅有三百萬人的曼尼普邦；防禦研究與分析學會（The Institute for Defence Studies and Analysis）也統計出在2000年至2004年間有450為的民眾遭軍方殺害。這數據證實了民族國家方針無法帶給曼尼普邦穩定的秩序，而目前的挑戰在於證實這樣的狀況係因政府的法律和政策而起。

## > 民族誌學者的挑戰

在印度當地的課程中，社會學與社會人類學之間並沒有明確的分野。其中，民族誌田野調查是課程的核心。M.N. Srinivas 的社會學課程大綱也是從民族誌著手，研究者透過直接參與觀察對象的日常生活，了解他們對自己生命賦予的意義。這假設了研究者的田野地並非刻意營造的環境，而研究者就像社群的一員共同生活，然而是否為社群一分子的界定是有爭議的（即使大致來說，印度東北區域的局外人指的是不屬於任何一個該地區社群的人）。擁有相同民族血統或家鄉背景的研究者，通常可以在東北地區被視為社群的一分子。即使如此，他們仍可能因為家族或政治聯繫不同而被視為外來者。

我在曼尼普邦的其中一個研究目標，是了解人們如何面對暴力引起的死亡，以及隨之而起的恐懼文化。身為曼尼普邦人，我被視為群體中的



像這樣的抗議行動是經常發生的。  
來源: Soibam Haripriya, 2011年。



2011年，為一名被印度軍隊任意抓走的年輕人舉行的抗議活動。  
資料來源: Soibam Haripriya。

一員，然而，信任關係卻是我碰上的其中一個難題。在面對這個問題時，首先需要重新思考田野中使用的專有名詞，例如「告密者」或「叛國者」等詞彙便不適合出現——規避指涉軍方組織成員的貶抑詞彙，也是取得信任的第一步；其次，當地普遍對學術研究產生抗拒感，這使得研究很難梳理出當地暴力氛圍的歷史脈絡，最終落得殖民民族誌的再製，得出當地人對彼此和外來者有著長期的敵意和猜忌心態的結論。一方面，即使沒有同意政府的暴力行為，「外來者」的研究也必定要涉及共謀問題；另一方面，由於此地互相猜忌的情形，進入田野的成功與否無可避免地受研究者的身分影響。目前當地社會已經實施國民經濟軍事化多年，研究工具與方法是否充足也需要再進行思考。第三，身為一個某程度上為「一分子」的研究員，進入田野地時最令我感到困擾的，是當地居民會依照針對政府的態度是否相同來將親戚、朋友和組織進行分類。大多關於田野地和調查方法的討論多關注受訪者的敘事是否為真，然而，像我所處的田野地，研究者反而是被觀察的一方；以往關於誠信度的問題都是針對受訪者，現在卻成了研究者的考驗。

### > 跨領域研究方法的必要性

為了擴展調查面向，本次研究使用跨領域方法，採用了1980至2010年間的詩集以增加田野地的描述。1980年，《武裝部隊特別權利法》的使用擴展至整個曼尼普邦，我透過當時的詩作了解恐懼的氛圍如何呈現在作品中（其他的文物，例如：歌曲、小說、短篇故事皆可以參考）。舉例來說，我參考了 Thangjam Ibopishak 的諷刺詩

作〈我想死在印度人的子彈底下〉，詩中有五個元素：火、水、空氣、地球、天空到作者的家中要將他殺害，直說到他們的任務就是殺了這名男子，卻沒有任何合理的解釋。作者央求他們使用印度製的子彈對他進行制裁，在他們無法承諾這個要求後，作者便逃走了。我分析出詩中所使用的五個元素象徵奪取受害者生命於其家中的匿名死亡小組（再次重申，要將這些暴力行為單純的究責是不可能的），沒有充分的裁決理由暗指這些死亡是荒唐且隨機的決定，而作者在詩中的訴求是對民族國家政策的諷刺，認為國家根本沒做到給予憲法人權的承諾。這首詩對因國民經濟軍事化出現的大量暴力表達了憤怒。

這類詩作的存在，使研究者得以觸及文本作者在可能受到生命威脅的情況下，對死亡作出的反思。這並不代表人類學家要為了詩作拋棄田野調查。我想指出的，是在缺乏直接證據的田野中，我們可以使用不同形式的資料進行研究。研究者需要小心的使用多重的方法論，然而，當「客觀」的研究方式無法找出此地暴力文化的脈絡，且民族誌被重新定義、歸屬為文學類別時，我們沒有理由不借用詩作進行研究。畢竟，詩作本身即嘗試透過創造與田野事實並存的社會知識，以抵抗那些意圖將歷史抹去的力量。社會人類學應該重新審視自身的研究方法、擴展其資料來源，並學習其他領域的專業，以保持對此田野地的批判性。■

來信寄至：

Soibam Haripriya <[priya.soibam@gmail.com](mailto:priya.soibam@gmail.com)>

# > 印度都市勞工的種姓制度與汙名

Shireen Mirza · Indraprastha Institut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Delhi · 印度



迪昂納是孟買的一個郊區，其因擁有該市最大的垃圾掩埋場而聞名。  
來源：Shireen Mirza。

**在**本文中，我認為身份認同的社會學一方面將種姓制度和宗教創造為不同社會類別，分別與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有關。另一方面，資本主義和都市化體系透過汙名化勞動力和空間隔離，將定義種姓和宗教的實踐混為一談。在這個脈絡底下，將汙名作為一個類別獨立出來是十分重要的，因為它可以研究跨領域的結構，並消除帶有殖民族主義血統的學術分類。本研究認為，我們需要新的分類來捕捉複雜的現實情況，且透過民族誌可以創造出新的類別。

## > 種姓制度與宗教的論述分歧

種姓霸權的社會學將種姓制度和被汙名的勞動之間的連結，追溯到印度教徒的宗教意識形態和傳統印度教社會實踐。種姓制度藉由「業障(karma)」(人的行為所產生的力量)、「法(dharma)」(正義的道路)和「瓦爾那(varna)」

(秩序)等觀念取得正當性，正如古老的印度教文本「摩奴法論(Manusmriti)」中所寫。這些思想建構了潔淨與不潔的價值觀，將印度社會儀式性地分等為四個社會群體，和位於瓦爾那之外、從事「不潔」工作的賤民(avarna)種姓。針對種姓制度純潔論述的社會學分析受到挑戰，這些分析被認為強化了上層種姓的文化優越，進一步促進他們的經濟和政治權力積累。有關種姓作為管理儀式上潔淨和不潔的印度教社會系統，相關的論述性理解也是有限的，因為它未能提供一個有用的框架來理解當代跨宗教群體間汙名、種姓相關勞動的空間實踐。

在論述方法中，種姓制度和宗教不只在認識論上是分歧的，兩者也是不同的領域。這種認識上的分歧—種姓是國家及其政治「內部」的一個類別，而(宗教的)少數群體則是一個「外部」類別，攸關長遠的伊斯蘭意識形態或針對當地社會脈絡所進行的調適—出現的同時，也伴隨殖民民

>>

族主義的特徵。以這個角度來看，一個「少數」的類別與一個透過種姓喪失而浮上檯面的宗教，兩者是同義的。在殖民民族主義的脈絡下，種姓制度和宗教作為社會領域而產生，概念上和階級、生產模式等政治和經濟勞動類別是不同的。種姓制度和宗教作為兩個無法比較的社會類別，兩者之間的根本差異，是殖民帝國將印度社會區分為不同宗教群體如印度教徒、穆斯林和基督徒的結果。因此，種姓制度和宗教的理論化仍然不受資本主義驅動的都市化影響。然而在實務上，這種二元論是站不住腳的，因為包括基督徒和穆斯林在內的非印度教群體，會因從事「不潔」的勞動而受到同樣的污名。被污名化的勞動不只影響個體，整個社群的存在都會被視為是不純潔的。這種本體論的不純潔與如婆羅門等「純潔」種姓的暫時不可接觸情況不同，該不純潔的狀態是暫時的，且可以透過淨化儀式來達到逆轉。

關於霸權的社會學進一步限制了關於當代種姓勞動實踐的解釋，因為它預設現代化理論中隱含的線性社會變遷模式。這是毫無幫助的，因為經濟和社會發展並沒有將封閉的階級制度轉變為開放的、以個體流動為基礎的社會分層體系。相反地，都市化和資本主義經濟導致種姓變得制度化，特別是在印度都市的衛生部門。

### > 污名化勞動和學術分類的撤銷

舉例來說，殖民孟買自治市的衛生部門使用白話詞彙 *kutchra* (印地語：垃圾) 來指稱都市垃圾，而 *kutchra* 之所以會出現和當地的熱帶條件與貧民窟有關，其極需在地的解決方案。尤有甚者，它採用波斯語的詞彙 *halalkhore* 作為公共衛生中的官方用語。*Halalkhore* 是指，視所有食物皆為合乎律法的低種姓穆斯林勞工。該部門還招募了以往為「賤民」種姓的印度教、佛教、基督徒和穆斯林，他們被認為其「傳統」職業就該是清潔、打掃、屠宰動物和清除垃圾。因為不潔被認為會體現在種姓身分上，自治市招募時將特定種姓身份與衛生勞工進行結合，使種姓勞動不同於一般經濟交易中的僱傭勞動。

在迪納爾(Deonar)垃圾山—由殖民衛生單位於1899年建造，是孟買市最大、歷史最久遠的垃圾場—撿垃圾的非正式勞動由成年印度賤民(Dalit Hindu Matang)種姓以及成年比哈爾穆斯林賤民(Bihari Dalit Muslims)執行。在

迪納爾垃圾山撿垃圾時，很難區分出誰是印度賤民、誰是比哈爾穆斯林。來自兩個社群的成員背著裝滿聚乙烯蓋子、玻璃瓶、廢棄鞋子和衣物的白色塑膠袋從垃圾山返回。每個人背著四到五袋他們所說的 *maal* (字面上的意思是戰利品，也可以理解成資源) 和一把用來在層層垃圾中進行挖掘，名為 *akdi* 的金屬鏟刀。頭上繫著一個手電筒，將別人不要的襪子穿在厚靴子外，以防止被丟棄的注射器和碎玻璃刺傷。這裡的常見景象是為了處理資本主義積累和丟棄文化所產生的過度行為，以淘汰、厭惡「壞」氣味、妨礙視野等理由為名，製造出了垃圾山這麼一個隔離的社區。

我的民族誌說明這種都市化模式參與生產了種姓制度和宗教的結合概念。這可以從迪納爾垃圾山周圍，賤民和穆斯林定居處的社區營造歷史中看出，垃圾山被規劃為「不潔」工業所在地的危險地帶。例如，在1947年的總體規劃中，該地區就被劃分為「廢棄地帶(*kutchrapatty*, waste belt)」，賤民和穆斯林勞工階級人口被重新安置到此區。污名，就此藉由強化種姓和宗教的跨領域身份，共同生產了由資本主義驅動的都市化。

我將污名理解為：當一個物體、個體或地方使人不安時，所體現的厭惡和不適經驗。種姓可被視為是污名化的社會政治實踐的一個子集，透過定義不潔、污染和失序的概念，來象徵性地表達秩序和分類系統。這說明了種姓和污名之間的連結—歷史透過這種方式被烙印在身體上。這代表我們不該將污穢或污垢視為一個客觀存在，而是視為一種文化類別，透過「其他」種族、民族、性別和宗教少數族群的實踐來詮釋，作為更廣泛的社會政治領域中的一部分。

將污名化這個社會政治進程置於前台，將開創一個更廣泛的框架，進而撤銷種姓和宗教的學術分類。為求做到這點，我們需要超越原先被認為無法比較的種姓和宗教類別，將它們融合到污名勞動的概念中，作為一個先驗又具偶發性的類別，同時不脫離政治。這就產生了一個重要的問題：現代性和都市化是否意味著普遍的污名化？■

來信寄至：

Shireen Mirza <[shireen@iitd.ac.in](mailto:shireen@iitd.ac.in)>

# > 數據缺乏阻礙 女性謀殺的識別及預防

Myrna Dawson, 社會和法律暴力應對研究中心, University of Guelph, 加拿大。加拿大正義與問責性女性謀殺觀察站, 暴力與社會專題小組成員 (TG11)。偏差與社會控制 (RC29) 以及女性、性別和社會 (RC32) 研究委員會成員

女性謀殺 (femicide) 的現象並不新鮮。不過, 這個議題在國際上受到的關注急劇上升卻是前所未有的事, 特別是在 COVID-19 疫情期間。在國際上, 這樣的關注所帶來的討論是: 是否該使用「女性謀殺」一詞來命名這個現象? 該如何定義「女性謀殺」? 要如何區分「女性謀殺」跟其他的凶殺案的不同? 而這樣的差異是怎樣運作的? 在這之中, 推動討論進展的關鍵是, 去系統性地記錄殺害女性與殺害男性的不同之處——那就是去區別出與特定女性謀殺的性/性別相關的動機/指標 (SGRMIs)。從 SGRMIs 可以得知暴力是如何從施暴者的厭女情結 (misogynistic attitudes) 中產生。這種厭女情結鞏固了對於女性的認知規範, 這包括視女性為男性的財產或視女性為被男性使用的客體等從屬地位, 以及伴隨這種心態而來的相關歧視、刻板印象和偏見。

## > 定義和區分女性謀殺

要定義女性謀殺可以從兩種方式來看: 「殺害的是不是全是婦女和女孩」或「殺害的是不是女性親密伴侶」, 以此洞察被現任/前任男性伴侶殺害的女性。這些方法可以簡單區分女性謀殺, 但被批評為過於簡化, 因其僅僅以性/性別或是受害者—加害者關係來理解這項複雜的現象。為了更明確區分女性跟男性其他兇殺案的因素, 我們將透過與女性謀殺最接近的男性加害者/女性受害者的兇殺案, 與其他性/性別的組合案件進行比較。

我們發現比起其他凶殺案, SGRMIs 在男性對女性的謀殺中更為明顯。這代表著女性謀殺的特殊性, 其超越了性/性別或是關係, 至少在加

拿大的狀況下是如此。在事故發生前常見的徵兆包括: 曾與警察接觸過、待定/實質分居、受害者曾受過威脅、親密/家庭關係, 以及預謀。女性謀殺事件中常見的要素還包括了動機 (例如: 嫉妒)、性暴力、肢解、重度暴力, 以及讓受害者裸露/半裸。就平均來說, SGRMI 的平均數據在男性對女性的謀殺中顯得更高。

## > 重大的資料缺失

在經常缺少關鍵資訊的情況下, 不但排除了能獲得更具體結論的可能, 也同時削減了能夠提供預防訊息研究的潛力。雖然在某些情況下也是能獲得資料, 但總體樣本和性/性別組合中的一致性很微弱。在男性對女性的兇殺案中, 數據缺失的範圍從受害者年齡的3%到加害者虐待兒童的前科紀錄的96%不等都有。平時可以預計到某些變數的資料最少, 但若考慮到 SGRMI 與女性謀殺的相關性可不是這樣。例如, 分居乍看之下是一個有充分證據的風險因素, 但 66% 的案例中都缺少了這項資料。此外, 儘管男性對女性的謀殺有增加的可能性, 但性暴力的資料在男性對女性的謀殺中比其他的案件組合缺少得更嚴重。而事故指標所缺少的數據反而比事故發生前的指標更少。

我們得出結論, 使用「女性謀殺」來命名和區分與性/性別相關的婦女和女孩謀殺非常重要——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在研究、教育和在提升意識所做的努力上使用 #CallItFemicide 的原因。若我們不去辨識出一項社會問題並命名它, 那這個社會問題將變得無法著手處理; 因此, 我們認為需要去區別以性/性別為基礎的要素並一致地衡量它們, 但由於缺乏可靠的數據, 很少

&gt;&gt;

# 「調查通常關注的是事件本身，而不是對於理解女性謀殺事件甚為重要的背景脈絡、周遭環境。」

有實證研究能夠清楚地證明這一點。在這之下，我們的研究是獨一無二的，因為它的原創性跟持續對女性謀殺的關注，和來自多項官方／非官方數據來源的多重檢核法(triangulation)。這些被發現有缺少的數據，其中蘊含的廣泛含義更令人擔憂：針對女性謀殺以及對婦女和女孩的施暴行為，這些數據可以更普遍地運用在加速其預防措施的發展，而不是僅讓各州或其代表定期地收集紀錄而已。這些數據偏見讓婦女和女孩的生命置於危險之中，這強烈地顯示了在預防上所做的數據收集比起僅僅的行政需求更加地急迫與優先。若要將數據收集重新定義為預防工具的話，第一步將從警方的調查開始。這會提供給我們更好的總體數據，但這需要研究、社區和政府之間穩健和持續的合作。

研究並不是法律和治理單位的業務，但他們可以向這些研究領域的人學習，透過以下這些方式發展以證據為基礎的數據：(1) 收集更恰當的資訊(2) 提供數據給在了解如何預防和應對暴力方面，能夠發揮關鍵作用的研究人員。儘管付出了這麼多努力，仍有一些地區和國際上的數據難以取得，特別是世界上的某些地區(例如：南非、拉丁美洲)；和某些婦女和女孩群體(例如：原住民、移民難民、住在農村或偏遠地區的婦女、身心障礙者)。對於許多國家來說，能收集到基本數據當然是最好。但為什麼，數據對於預防女性謀殺以及預防男性對婦女和女孩施暴來說明明那麼重要，卻沒有系統性、定期地收集這些數據呢？

## > 「公共父權制」和資料收集

我們認為，父權社會結構的歷史和持續帶來的影響是一個關鍵因素，包括歷史和當代決策者的角色，他們從不優先收集這些數據。這些決策者持續充當數據的看守人，決定誰可以使用

數據，或是如何去使用這些數據。例如，刑事司法體系就是一個父權制、傳統男性化的機構，從警方調查和起訴的數據記錄可以知道這個事實。儘管女權主義的研究證明了理解女性謀殺中受害者和施暴者之間關係非常重要；但我們的研究顯示，目前調查的重點——以現有數據來說——仍然著重在事件本身，而不是在關係背景和對理解女性謀殺來說很重要的周圍情境上。

這種「公共父權制」和相關決定的持續影響產生了性／性別上的數據偏見。無論有意與否，這些偏見都會使婦女和女孩處於危險之中，因為數據主要都是以男性為基礎，由男性生成、也為了男性而生成。數據收集工具最初是設計來觀察男性對男性的兇殺案。這樣的做法排除了，能夠收集重要數據以防止男性對婦女和女孩施暴的可能。如果我們不能確實地紀錄女性謀殺，那麼記錄男性對婦女和女孩的其他施暴形式不是更沒希望了嗎？除非國家和大眾承認女性謀殺是值得探討的現象，否則我們做不到這樣的事。這需要挑戰根深蒂固在階級制度裡的「價值主體」(worthy subjects)，其往往隱藏了婦女和女孩的受害情況，特別是某些婦女和女孩群體。■

來信寄至：

Myrna Dawson <[mdawson@uoguelph.ca](mailto:mdawson@uoguelph.ca)>

延伸閱讀：

作者最近關於此主題的較長文章可由以下連結查看：[英文版](#)、[法文版](#)。

# > 美國政治中的 種族主義與反環境主義

Ian Carrillo · University of Oklahoma · 美國 · ISA經濟與社會(RC02)研究委員會成員



位於西弗吉尼亞州波卡的約翰E阿莫斯煤電廠陰影中的公司小鎮。  
來源: Wigwam Jones · CC BY-NC-ND 2.0。

**對**美國的集體行動議程而言，種族主義、白人至上主義仍然是懸而未解的核心問題；這些問題與環境不正義與氣候變遷議題，皆是威脅著社會福祉的重大危機。在我最近於《Current Sociology》期刊發表的文章〈[The Racial Fix and Environmental State Formation](#)〉中，我闡述了美國政治經濟中種族主義與反環境主義的關係。我認為種族政治對於促成環境政策的政治經濟因素而言，是極為關鍵的因素。

我將種族主義與反環境主義交織於政治經濟中的現象指稱為「種族修復」(the racial fix)，意即種族與種族主義是作為一股逃避力的驅動機制，這股力量可能減緩、甚至扭轉環境的破壞。

## > 種族修復的空間性

在美國，種族修復主要以三個方式運作。首先是空間——種族與空間之間的關係，決定了哪些人口將成為環境議題後果的承擔者。種族如何影響誰能成為美國人口、能夠居住在哪些地區，皆是至關重要的問題。由歷史來看，移民政策一直都有利於歐洲人，以及那些意圖在美國尋求永久居住地的白人多數。不管是過去還是當代、城市、郊區還是鄉村地區，種族隔離的現象皆意味著居住模式曾是、也將是種族化的。

種族主義形塑了居住隔離與移民的現象，也為環境正義帶來影響。被隔離的有色人種社群成為廢棄物、危險活動的儲藏區；作為多數的白人則享受著整潔的環境設施。同時，白人多數也透過處理環境問題的民主手段，將有色人種社群阻隔於外。

>>

## > 種族修復的政治性

種族修復的第二個面向是其政治性。在每國，民主制度的設計有利於白人，卻不利於有色人種。這是因為美國政治過去與當代的發展中，種族主義一直是懸而未解議題。舉例來說，選舉人團的成員擁有選出總統的權利，其設立本身最初及是為了捍衛奴隸產業的利益，並限制大眾參與民主的可能。美國於1965年才成為一個包容不同種族的國家，然而自那之後，種族主義政治家持續地嘗試阻礙有色人種取得政治權利。這些政治家除了推行大規模的監禁政策，使得有色人種入獄、與其社群離散之外；更基於種族主義對於有色人種與移民會在投票上動手腳的迷思，通過了限制投票權的法規。在結構層次上，政治制度仍然有親白人的性質：白人不管在立法院、議院、選舉人團、最高法院之中，佔的比例都過高，而白人的政治偏好（尤其是鄉村白人）也更容易在其中被呈現出來。其中，最高法院的以及其成員所行使的正義，也是由議員與總統定義的。白人的結構性優勢所造成的後果，已經顯示的很清楚——1965年，最高法院最近廢除了投票權的法案；國會選區的劃分也越來越傾向有利於保守白人選民，國會本身更在抵制州立法機構的反民主趨勢上遭遇困難。

種族修復的政治性對於環境政策非常重要，因為大多數種族主義政治家也抱持著反環境的觀點。在這種觀點的耦合之中，種族主義成為了阻撓公共利益——例如一個公平與穩定的環境——實現的工具。這與「狗哨」(dog-whistle) 政治的概念類似，即政客使用與種族化的語言妖魔化有色人種，並使得政府項目失去正當性。雖然狗哨政治最初僅將對象集中於福利政策，不過這種種族化的概念，最終也延伸至環境政策的制定上。如此一來，種族化的仇恨與對環境保護的敵意，便在保守派政治家、白人選民之間交疊，成為了美國政治中的結構性多數。

## > 種族認同政治與個人心理學

種族修復的第三個層次，是種族認同政治與個人心理學之間的關係；其對於形塑大眾對於政府環境與氣候保護計畫的認知極為重要。過去二十年來，有幾個風潮強化了白人認同政治與反環境主義立場之間的連結。首先是2008年歐巴馬當選後，保守派領導人與政治家，透過將歐巴馬描繪成一個環境種族主義、有信仰的、來自外國的「他者」，以攻擊其政策的合法性。這些行動不只使得白人投票者取得種族上的優勢，進而否決了健康保險法案，更阻礙了巴黎氣候協議與環境保護機構的發展。其次，是保守派領導者煽動白人的種族焦慮，並透過白人將不再是人口多數的趨勢，將這股焦慮與正轉變的民主風潮連結。這股視有色種族為威脅的態度，進一步加強了白人認同政治與反環境主義之間的關聯。例如，著名的反環境主義政治家如川普，即透過激起本土主義、種族主義、對於「白人將被取代」的恐懼，取得了政治勢頭。這項種族主義行動深植於圍繞著恐懼與群體威脅的情緒，將個人心裡層面與反對解決環境、氣候問題的政治經濟意識連結起來。

這套政治經濟意識的中心，是工業與政府中的一些菁英，他們利用種族與種族主義捻熄任何可能危及環境與氣候保護的集體行動。在美國，這套菁英化的策略有著深遠的歷史。例如，在1676年的多種族勞動抗爭——培根叛亂之後，菁英建立了區隔白人與黑人勞工的種族化政策，進而阻礙未來跨種族勞動的團結。不幸地，如今的菁英仍然以環境與氣候不正義為名，操弄著這套區隔與征服的遊戲。如同過去侵蝕公共利益的菁英政策，這些行動嚴重地傷害了有色人種，甚至最終對白人的生活造成負面影響。環境不正義、氣候變遷導致了地球的不穩定狀態，恰好顯示了白人至上主義如何強化這種物質條件，並反噬了支持者自身。為了維繫未來世代的氣候與環境，將種族修復的火苗熄滅將是必要的；同時，我們應修正、重整受傷害的有色人種社群，並以種族與階級正義為根基，建立強有力的氣候與環境制度。■

來信寄至：

Ian Carrillo <[icarrillo@ou.edu](mailto:icarrillo@ou.edu)>